

第七章

西安事變的歷史功臣



飛將軍 蔣鼎文



一、苦勸與苦諫

古城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改變中國近代史進程的「西安事變」爆發。這次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在西安召開軍事會議的蔣介石委員長及蔣鼎文、陳誠等十數名重要軍政大員扣押，並通電全國，宣布「停止一切內戰，對外一致抗日」的八項主張，舉世震驚。

早在一九三五年秋，蔣介石令「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從武漢遷到西安，名稱也改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自兼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原在西北的楊虎城十七路軍、寧夏的馬鴻逵部、青海的馬步芳部均歸張學良指揮。

張學良甫到西安，就對紅軍展開大肆圍剿，忠實執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九月，張學良部署對陝北紅軍的作戰，以王以哲為中路，楊虎城為右路，董英斌、何柱國為左路，三路夾攻紅軍，配以中央軍胡宗南部支援，期望一舉平定陝北。然，十月一日，紅軍在嶓山伏擊，殲滅一一〇師兩個團及師部，師長何立中身亡。嶓山之役，張學良認為紅軍是僥倖取勝，及至十月二十五日拂曉，紅軍進攻甘泉、富縣之間的榆林橋，殲滅東北軍一〇七師六一九團，俘獲團長高福源，張學良著實驚怯，對紅軍刮目相看。高福源是一員驍將，如此輕易為紅軍所俘，看來紅軍很有戰鬥力。不意張學良十一月在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大會議期間，所部又與紅軍發生直羅鎮戰役，導致東北軍一〇六師被殲一個團，一〇九師兩個團及師部被殲，師長牛元峰陣亡。這幾次參戰的是東北軍中的精銳，可謂身經百戰，經驗豐富，張學良感到對共產黨不可輕視。「匪」是「剿」不完的，外辱當頭，兄弟不能攜手對敵，無益的內戰委實可惜，「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

焉」。¹

這幾仗，東北軍損失慘重，兩個師的兵力被殲，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撤銷一〇九、一一〇兩個師的番號，停撥軍餉，甚至連張學良為兩個師長請發的二十萬特恤金也被駁回，張學良有所看清蔣「一石二鳥」的廬山真面目。以往的委曲求全，前提是須保證東北軍實力，如今東北軍日漸削弱，繼續與紅軍作戰，無異於自殺，張學良自然不願再去剿共。

張學良身邊的朋友、部屬也積極地推動他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特別是黎天才、杜重遠對他的幫助更大，而高福源的被俘歸來催化了張學良思想的轉變。高福源向張講解共產黨聯合全國抗日禦辱的誠意，並將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周恩來在信中寫道：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殺死骨肉兄弟以飽狼腹，非人類所為。所說與張學良的感受和主張吻合。張學良當下讓高福源返回，請中共派正式代表商談合作抗日事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信張學良，信中說：

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反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²

¹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見《張學良文集》（二），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一九三頁。

²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四七頁。

與此同時，張學良和楊虎城之間關係也發生變化。楊虎城作為西北的地方實力派，對東北軍到達陝西，且兵力又遠強於西北軍，難免有反客為主之慮，也導致說不清的猜疑和隔閡。然自一九三六年六月以後，張、楊二人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則經常在一起秘密談論抗日聯共的事，為培養抗日骨幹，他們在西安的王曲聯合創辦了「軍官訓練團」。軍訓團公開研討有關抗日的問題，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言論，商討聯共抗日的可能性。這些言行在軍官訓練團骨幹中已不是秘密。

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已經心靈相通，「三位一體」的抗日凝聚體初步形成。

自從張學良到西安任職後，蔣介石時時關注其動態，張學良對他布置的剿共任務，往往虛與委蛇，消極被動，嚴重制約了他剿共計畫的安排和實施。近來，關於張、楊與紅軍秘密接觸，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一致對外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傳到他的耳朵裡、案頭上。蔣對地方實力派為保存自己實力而和紅軍暗通款曲，因為見得多了，有點見怪不怪。他要親赴西安，直面張學良，向他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重要性。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從南京飛赴西安。此前，蔣、張在「安內攘外」的次序上雖有不同看法，總還有些遮遮掩掩。真正鑼對鑼、鼓對鼓，也即一方苦勸、一方苦諫的攻防大戰，由此才真正拉開帷幕。

苦勸與苦諫有時是交叉的，甚至是互詰的，有時則是單向的，如演講、訓辭、電報電文等。唯一相同的是，蔣介石心急迫地勸說張學良速剿紅軍；而張學良也心情急迫地諫阻蔣趕快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

蔣介石讓張、楊立即剿共的決心堅決，但在初始階段，態度柔性，他不想把氣氛搞得過於緊張，蔣介石以非常信任的口吻對張學良說：「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給你了，誰說什麼我都不聽，誰有意見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¹其後幾天，蔣多次與張、楊談話，宣布他的剿共計畫。他認為，陝北的紅軍，最多不超過三萬人，勢孤力單，根除並不難。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張、楊不僅不同意繼續剿共，相反卻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蔣介石聽過張、楊的表態與建議後十分惱火，他厲聲地說：「風吹草動，兵隨將走，當統帥的不動搖，當兵的就不會動搖。」他大罵張、楊是「中了共產黨的魔術了」，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

十月二十七日，為宣揚「攘外必先安內」主張，蔣介石親自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王曲軍官訓練團原本是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培養抗日力量而籌辦的，在張學良、楊虎城的主持與支持下，軍訓團自成立起就洋溢著救國熱情。

蔣介石說：「我們革命軍人首先要明禮達義，在家要盡孝，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顛倒，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²

1 轉引宋連生著：《蔣介石與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八頁。

2 《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一頁。

蔣介石的訓話不但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受訓將士的氣憤。他們沒有想到，三軍統帥不但鼓勵他們抗日，反而冷卻他們的抗日熱情。

十一月一日，蔣介石到洛陽軍分校再次強調「攘外安內」，他說：「現在斷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張聯共，否則就要出賣國家民族，存心與共匪同聲相應，甘心為共產黨下面的二等漢奸。」他還說：「共產黨不要祖國，不要祖宗，然則你們也不要祖國、不要祖宗了嗎？共產黨是要亡中國的。這種敵人不打，還要什麼抗日？當面敵人不打，偏要打遠處的敵人，這種軍隊有什麼用處？」¹

站在一旁的張學良心灰意冷。他後來回憶說：「蔣公在閱兵後訓話，痛斥共匪為大漢奸，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聽之下，有如涼水澆頭，良欲向蔣公陳請者，至是則絕望矣，沮喪萬分，回至寢室，自傷飲泣。」²

張學良清楚，蔣介石的這些話也是講給他聽的。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從洛陽乘專車再度來到西安。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做了最後一次苦勸，實際上是讓張、楊做選擇題。蔣介石提出中央圍剿陝北紅軍新的作戰計畫，並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告訴張、楊，如不服從這個作戰方案安排，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沿海，十七路軍調往安徽。

再來交代下張學良、楊虎城是如何苦諫的。

在十月二十二日之前，也即在蔣介石抵西安之前，張學良給蔣介石發了一封言辭慷慨、語氣懇切的電報，電報說：「居今日而欲救亡圖存，復興民族，良以為除抗日外，別無他途。比來寇入益

1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文集》（二），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一九三頁。

2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文集》（二），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一九三頁。

深，華北半壁河山，幾全淪陷，而多數民眾咸感覺忍無可忍，抗日聲浪，漸次彌漫於全國，中樞（有）領導民眾之責，似應利用時機，把握現實，堅實眾之信仰，而謀抗敵之實現。否則民氣不伸，騷動終恐難免。彼時中樞或反處於被動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來擁護統一，服從領袖，人縱有所不諒，我亦矢志不渝，固為分數當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復，隱痛日甚，愧對逝者，愧對國人。所日夜隱忍希冀者，惟在舉國一致之抗日耳。」¹

十月三十一日，是蔣介石的五十大壽。為避壽，他從西安奔至洛陽，張學良決定乘這個時機再次進諫。其時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來到西安。此前，閻與張就曾一起商討過聯合抗日。閻錫山所處晉地在西北抗戰前線，對於日本蠶食華北比別人更多一分警覺。張學良與閻、傅二人作了深入洽談，三人決定同飛洛陽進諫。

壽慶活動結束後，張、閻見蔣正在興頭上，便向委員長訴說東北軍和晉軍的心境。張學良說：「流亡的東北官兵，到西北來剿共，離家鄉一天比一天遠。」說到這兒，離鄉背井的酸楚湧上心頭，眼睛亦濕潤了，他繼續說，「共產黨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回東北老家去，我們的官兵聽了怎能不動心。」又反問蔣，「共產黨與日寇，究竟誰是中國國家民族的最大敵人？」蔣介石當然不會被張學良的激情所感染，他沒有正面回答張學良的提問，而是看了看沉默不語的閻錫山：「百川，你說誰是最大的敵人？」閻錫山以慣有的穩重，不疾不徐地進諫：「依我看還是日寇。漢卿講的停止內戰，實行全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蔣介石聽了很是不滿，他衝著二人說：

1 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二三頁。

我現在只要「你們答覆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該服從我？」¹張、閻二人眼神交流，覺得蔣介石剿共態度堅決，無法說服，只好告退。

洛陽碰壁回來，張學良給蔣介石寫了封長信，有「家仇國難集於一身，東北父老盼望國軍收復失地，有若大旱之望雲霓」等語，但蔣介石隻字未覆。綏遠抗戰爆發後，東北軍強烈要求援綏抗日，蔣介石依然不予理睬。十一月二十七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請纓抗戰書》：

綏東局勢，日趨嚴重。日軍由東北大批開入察境，除以偽匪為先驅並用飛機助戰外，已將揭開真面，直接攻取歸綏。半載以來，良屢以抗日救亡之理論與策劃，上瀆鈞聽，荷蒙曉以鈞旨，並加諭勉，感憤之念，與日俱深。今綏東事既起，正良執殳前驅、為國效死之時矣。日夕磨礪，惟望大命朝臨，三軍即可夕發。蓋深信鈞座對於抗日事件，必有整個計畫與統一步驟，故惟有靜以待命，無煩喋陳。乃彼大軍調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到達，而寵命迄未下逮於良。繞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洗一分之前愆，為國家盡一分之天職。²

這是一封淚血並俱的請戰書，真切表達了張學良和東北軍將士開赴抗日前線的強烈願望和決心，但蔣介石卻於十二月二日在張的請戰書中批下「時機尚未成熟」六個字，拒絕張學良及東北軍

¹ 李義彬：《震驚世界一幕——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四九頁。

² 《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〇八頁。

的抗戰要求。

張學良仍未放棄努力，十二月三日，他隻身駕機又飛往洛陽，晉見蔣介石：「委員長，不是學良非要違背您的意願，實是幾年來國難家仇，使學良中夜彷徨，有鯁在喉！委員長，請您正視一下現實吧，這些年來，黨爭兵爭，億兆愁若，內失統一之力，外無禦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戰禍連綿，生靈塗炭。災荒無救，饑饉在途，這樣下去，將是人無樂生之心，國有累卵之危……」¹

沒等張學良說完，蔣介石怒斥：「放肆！」張學良態度強硬地反問：「委員長，請問你這樣聽不得意見，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你同袁世凱、張宗昌還有什麼區別？」這話生生地刺痛了蔣介石：「好你個張學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他上前一步，指著張學良：「全國只有你一個人，除了你張學良，沒有第二個人敢這樣對我講話，沒有第二個人敢這樣批評我！」他越說越氣，越氣越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黨暴徒。」

儘管屢次碰壁，儘管雙方極度不滿，但張學良還是對蔣介石抱有一往情深的執著，十二月七日下午，張學良隻身來到華清池直諫。

蔣介石依然如鐵石一般，沒有絲毫鬆動。此時的張學良聲淚俱下地說：「委員長，自東北易幟以來，我對委員長忠心耿耿，服從訓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國難之後，各方怨謗，集於學良一身，唯有委員長能夠體察保全我。學良向來以為，委員長的事業就是民族的事業，縱使粉身碎骨，也難報答委員長對我的厚待。」

¹ 劉禹：《張學良大傳》，青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五七頁。

言及至此，張學良泣不成聲。他定了定神，接著說道：「可是，出於對領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進諫。當前的國策，應當是槍口對外。學良已數日寢食不安。思考多次，以為委員長必須放棄「剿共」，領導全國抗日。否則，將成為千古罪人！」儘管張學良已是「哭諫」加「血諫」，然蔣的態度絲毫未變，最後他拍著桌子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¹

張學良澈底絕望！

二、新職成為導火線

戰爭、政變、兵諫之類事件的爆發，一般都有切入點和導火線，這種大事往往在適宜的土壤醞釀發酵，並漸趨成熟，但在什麼地點和時間節點上觸發，卻有偶然，而這種突發的偶然，往往有必然的原因在裡面生發。

蔣介石自十月二十二日到陝西後，一直在西安和洛陽之間調查摸底，也一直在部署剿滅陝甘邊境的中央紅軍事宜。經過多次實地考察談話，他對依靠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來肅清紅軍已失去信心。他要重新調整軍事部署。

其時，南方陳濟棠問題已經解決，桂系亦被迫妥協，國居大軍在那裡已無必要，蔣介石有足夠精力和兵力對付局限在陝甘邊境的中央紅軍了。於是他將原駐防西南或擬開往西南的國民黨中央大軍，漸次調到西北來。對此，西北剿總已有覺察，時任西北剿總第四處處長盧廣績是這樣記述的：

¹ 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二六—一二七頁。

當天晚上，我因公見張（學良），順便問他：「西南問題和平解決，打桂系的中央軍將調往何處？」我這一問，似乎引起了張的注意。他說：「我看蔣將把這部分軍隊調往四川，蔣對劉湘的痛恨比對我們厲害。」然而事出張的意料之外，就在第二天，蔣發來電報，要調二十五個團的部隊來西北。張把這個消息告訴我之後，又約來吳家象、黎天才、應德田等。張對我們幾個人說：「你們幾個人先談一談。」¹

很快，中央軍主力源源不斷地向西北開來，先前從西北他調的胡宗南、關麟征主力率先歸位，俞濟時八十七師向陝西挺進，萬耀煌的十三師來到咸陽，王耀武師部署漢中，董釗的二十八師進駐臨潼。在大軍彙集的同時，各種謠傳亦紛紛而至，說蔣介石準備調入三十萬中央軍到西北剿共，張、楊如不服從，將一併解決等等。西安的上空瀰漫著緊張氣氛。

蔣介石十二月四日從洛陽回到西安，找東北軍、西北軍將領逐個談話，明確告訴他們：要嘛服從命令，全部投入陝北前線，配合中央軍進剿紅軍；要嘛讓出陝甘，張之東北軍調往福建，楊之十七路軍調到安徽，剿共的任務由中央軍來完成。

那麼，調入西北的這麼多中央軍由誰來指揮呢？蔣介石經過「苦思焦慮」，選中了蔣鼎文。對於這一安排，劉峙是這樣回憶的：

一九三六年的十月，蔣公又到洛陽，因張學良、楊虎城剿匪不力，且有與匪勾結的傳聞。蔣

¹ 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八九頁。

公於度過其五十誕辰後，經苦思焦慮的結果，決心一面親赴陝西坐鎮，一面命蔣鼎文親率中央大軍進剿。¹

蔣介石的「苦思焦慮」亦反映在他的日記中，十二月五日記：「派蔣鼎文為西北前敵總司令」，十日又記：「發表蔣（鼎文）、衛（立煌）名義」；蔣介石又在十二月八日、十一日把派蔣鼎文為前敵總司令的命令電告閻錫山與何應欽。

蔣鼎文是十二月初接到命令的。其時，蔣鼎文正從福建的綏署總部（已從龍溪移至建甌）赴浙江諸暨盤山途中。原來這年的十二月四日是他母親杜氏七十歲生日，他返鄉為其母祝壽。蔣鼎文是一個孝子，侍奉雙親可謂周到。民國十九年，他駐節武昌，其父蔣子朗從諸暨趕去看他，見他軍務繁忙，怕其分心，便提前返鄉。哪知，這一分手竟成永別。返鄉不久，蔣子朗一病不起，不久撒手人寰。噩耗報至軍營，正是中原大戰激烈膠著之時。直至大戰結束，板蕩初定，蔣鼎文才返諸暨盤山補辦葬禮儀式。為此，蔣鼎文一直愧疚於心，他要將這份愧疚補償於尚健在的母親身上。其母七十大壽來臨之際，他向中樞請假，從福建趕緊趕直奔浙江而來。然而人未到達諸暨，就被衢州綏靖處主任張發奎截住，交給他一分蔣介石發來的限時到達西安的緊急電報。蔣鼎文不敢懈怠，在衢州綏署打電話給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訂好赴西安機票，然後匆匆趕到諸暨，即日為母親辦了祝壽酒席，並向母親作了歉疚的說明。叩頭行禮一畢，迅即趕赴上海，乘飛機抵達西安，終在十月八日限定之日到達。

¹ 劉峙：《西安事變的解決》，見李立編《親歷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三八二頁。

蔣鼎文下榻於西京招待所二〇七號房間，行裝甫卸，即到臨潼華清池。蔣介石見蔣鼎文到來，稍問蔣母祝壽情況後便直奔主題，告訴他，經過慎重考慮，讓他即時在西安出任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福建那邊職務暫兼，待西北戰事告一段落後再予考慮，至於剿總的總司令則由蔣介石本人續兼，副總司令仍由張學良擔任。

顯然這是一副千斤重擔，蔣鼎文壓力陡增。蔣介石一方面對他這幾年在閩贛剿共肯定有加；一方面也知道他與張、楊，尤其是張學良關係不錯。蔣介石把蔣鼎文調來實際主持西北剿共事宜的同時，也希望憑他的處事能力，能團結張、楊向心合力，不致他們離蔣介石而去。

當時西北剿總的基本班底是：張學良下面有參謀長晏道剛、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米春霖，管軍事的一處處長徐方，管軍需的二處處長閔湘帆，管總務的三處處長馬效韓，管行政的四處處長盧廣績，還有糧秣處處長張政枋，交通處處長蔣斌，軍法處處長趙鴻翥，軍醫處處長任作楫。除晏、徐、閔為蔣介石所派外，其餘均為跟隨張學良多年的舊部和親信。

西北剿總指揮的兵力是陝、甘、寧、青四省的部隊，計東北軍二十萬人、十七路軍四萬人、寧夏馬鴻逵部二萬人、青海馬步芳部一萬人。胡宗南駐甘肅的三萬中央軍，張學良的總部不能調用，由蔣介石直管。¹

如今由蔣鼎文出任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他不但可指揮胡宗南部及所有調入西北剿共的三十萬中央軍，還可指揮原在西北地方的二十七八萬兵力。前敵總司令這個位置非常特殊，在直接對敵方面，有時強過副總司令。按照蔣介石指揮體系和習慣，他往往不通過副職，甚至正職，而是直接下

¹ 晏道剛：《我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歷》，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九八頁。

令給前敵總司令貫徹執行（如第五次圍剿時，陳誠即為北路軍前敵總司令）。這樣一來，張學良的西北「副總」之位實際上不知不覺間被架空。且西北剿總的前敵總指揮部不設在西安，而是放到陝甘寧三省相接處平涼，這一地點顯係與中央紅軍近距離接觸。

吳相湘則認為：

蔣鼎文之受任新職，自然是由於他勇敢善戰，對於剿共具有經驗，同時並有其他因素，按之計畫：剿匪軍總司令是蔣委員長兼任，張學良任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而以蔣為前敵總司令即因張（學良）與蔣（鼎文）感情較洽，（兩人）可以合作無間。¹

蔣鼎文曾以責任太大、力不能任為由，向蔣介石提出另選他人的要求，蔣介石不允許他辭讓，並讓他即刻調配參謀班子上任。蔣鼎文於是讓隨行副官何國華馬上電告建甌參謀處，讓李家鼎組織總司令部幕僚班子，剋日前來西安。

當日下午，蔣鼎文與張學良見面。張知道蔣鼎文是重義正直之人，兩人談話不作客套。張告訴蔣，抗日之事他與委員長分歧依舊嚴重，分歧點還是在攘外安內的次序上。蔣鼎文當然知道蔣介石的部署，即對張學良說：

抗日之戰事，我們都一樣急迫，但依我國目前之實力和軍事力量尚不能草率，副總司令應該

1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四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一八二頁。

看到各方面都在積極埋頭準備抗戰，如全國兵工廠正在晝夜趕造槍炮彈藥，即是一例。¹

這次張、蔣談話，對張頗有觸動，張學良事後回憶說，蔣鼎文在談話中流露出讓他交出軍權之意。²

研究西安事變的書籍多指出，張、楊決定「兵諫」是十二月八日最終定下來的，或與這次談話有一定關聯。周恩來也有過分析：

蔣介石對張學良將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以後召集西安會議，陳誠來了，蔣鼎文也來了，是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的。這樣就逼出一個西安事變。³

自這日開始，蔣介石與張、楊之間的攻防暗戰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十二月九日，蔣介石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寫了一封密函：

力子主席勳鑒：

1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刊行，第一九頁。

2 范克明、周亞蘭：《張學良傳》，長江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七九頁。

3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九二—一九三頁。

可密屬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十一日，蔣介石電告何應欽，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總指揮部暫駐平涼，一星期之內，撥派無線電臺一部，歸該總司令使用。¹

同日下午，蔣介石把張學良、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等召集到臨潼華清池晚宴。席間，為撫慰張學良的不安情緒，也為澄清有關傳聞，蔣介石向張學良說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話：

漢卿，現在銘三來了，我知道你們二人意氣相投，我命他到此協助你，今後剿匪軍事，我派他為前敵總司令，總部設平涼，由你指揮他，再由他轉知于學忠、楊虎城、陳誠、朱紹良、衛立煌各總司令辦理，限你們在三個月內肅清殘匪。²

對於蔣鼎文新任之職，張學良這位西北「剿總」副總司令有點猝不及防，且頗感不快。張學良的親信盧廣續如此回憶：

¹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² 分見《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一九頁，臺北《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委派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事前沒有同張學良將軍商量。蔣鼎文被委派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就是說，對以後西北的剿共任務，要由蔣介石直接指揮，而不通過原來的西北剿匪總部了。這是蔣介石對張學良和東北軍不信任的具體表現。張自己已經感覺到了。

十二月十二日，《大公報》要聞版刊出該報西安記者按蔣介石密囑發給報社的專電，四行標題：「陳誠指揮綏東軍事，蔣鼎文負責剿共，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大公報》採用大號字「蔣鼎文負責剿共」做主題，對蔣介石密囑的主旨作了點睛之筆的版面安排。電文如下：

（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日內赴太原，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邵力子、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陝將領，邀各界作陪，到六十餘人，盡歡而散。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讀者拿到這天的《大公報》時，報上所列的命令發布者和受命者都在這一天成了張、楊的階下之囚，可算得上新聞史上別樣的趣聞。

面對蔣介石的步步緊逼，張、楊這邊是這樣應對的：

十二月九日，西安大中專學生發生請願示威運動，在趕往臨潼華清池時，被張學良攔截。張學良苦口婆心相勸：

各位同胞、同學，我張學良不是不救國的，我的心情和你們一樣的，自從失掉東北四省，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罵我張學良，我何嘗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我不是願做亡國奴的人，我與日寇有殺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後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戰場的！請你們大家相信我，你們的救國心願，我不忍辜負，在一星期內，我準有滿足你們心願的事實答覆你們。請你們今天暫行回去，我不欺騙你們。同學們，我是國家的軍人，我不是蔣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騙你們，我張學良願意你們群眾在任何地方，把我處死。你們可能相信我吧！¹

請願者見張學良如此誠懇，也被感染。為避免無謂犧牲，決定返回城裡。張學良驅車前往臨潼，在向蔣介石說明情況的同時，重點轉達了學生的要求，勸他俯察民情，領導人民抗日。蔣卻指責張學良不該替學生說話：「你究竟站在什麼立場？是站在國家大員的立場，還是學生的立場？你究竟是代表我，還是代表學生？一個人不能同時做兩方面的代表而站在中間。」還說：有人侮辱領袖，你們不和他拼命，還有什麼可說。他怒斥張學良失職，認為對遊行請願的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

¹ 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二八頁。

張學良說：「我是如實報告情況。我瞭解他們，他們主要是要求政府抗日，並無惡意。」

蔣介石認為：「這些活動都是赤色分子煽動起來的，怎麼說沒有惡意？既是學生，就應當好好讀書，可有些人偏偏不這麼做，動不動就遊行，衝擊政府，破壞交通，甚至聚眾鬧事，毆打政府官員，請問這算什麼好意？對這些人不用機關槍打行嗎？」

要用機關槍打學生？積怨多日的張學良被蔣介石這句話激怒，各種因素所致，使他忍無可忍。

五十三年以後，張學良對蔣介石這番話還是念念不忘，他在美國對王冀教授談起了他平常十分忌諱的西安事變話題：

今天我忍不住，我對你們說，事實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對學生說，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面人，怎麼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學生？這我已不高興了。但他接著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可把我氣火了，我話都到嘴皮子，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打學生？我氣極了。這話我沒說出來，蔣先生也看到我變了臉，我臉都氣紅了。¹

同一天晚上，張、楊盡東道主之誼，在西安易俗社舉行戲劇晚會，招待來陝國民黨要員。由於「兵諫」之弦繃得很緊，東北軍和西北軍險些鬧出烏龍，張、楊虛驚一場。

¹ 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二二頁。

十二月十日下午，張、楊再度會商，對兵諫蔣介石及扣押赴西安中央文武大員作了緊張而又秘密的軍事部署。

十二月十一日晚，待蔣介石在華清池舉行的宴會匆匆結束後，張學良駕車載著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返回西安再赴宴。在車上，張學良對蔣鼎文等人戲言：「各位買了人壽保險乎？」¹蔣鼎文等感到莫名其妙，殊不知張學良話中有話。這場招待中央大員的「鴻門宴」匆匆完畢。約十二時許，張學良率東北軍將領十多人趕到楊虎城的新城大樓，兩人在陝西綏署總部即刻指揮武裝扣押事宜：由東北軍負責在臨潼武力扣押，由十七路軍負責在西京招待所武裝扣留蔣鼎文等十多位中央要人。

在蔣介石張弓搭箭、欲射未射之際，張、楊搶先一步開弓，這是蔣介石所沒有預料到的。

三、槍聲響起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新城大樓。張學良、楊虎城此刻的心情十分緊張，儘管他們已經預判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並準備了應對的措施。

臨潼華清池扣押蔣介石，由東北軍張學良衛隊第一營王玉瓚、第二營孫銘九具體實施。經過一番周折，他們終在驪山半腰將蔣介石抓獲。

待臨潼槍響後，城內西北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率部包圍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當時西安唯一的高等旅館，達官貴人及社會上的名流富商來西安均下榻於此。其時奉蔣介石之命來此開會的軍政大員都住在西京招待所一樓和二樓。蔣鼎文、陳調元、朱紹良、張沖、衛立煌等住在二樓；陳誠

¹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刊行，第二〇頁。

和邵元冲住在一樓，邵元冲的房間在樓房東部頂端，緊靠圍牆；住在三樓的是三位外國人，分別是美國路透社記者尼經·史沫特萊、張學良的德籍顧問和另一位美國商人。在武力扣押過程中，除邵元冲越過圍牆逃跑被士兵打成重傷外，其他南京軍政大員，包括家屬和外國客人均予安全拘留。上午八時許，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到九點多鐘，孫銘九一行將蔣介石從臨潼送至新城大樓。

蔣鼎文險些成為第二個邵元冲。原來，蔣鼎文昨晚參加張學良宴請後，又赴同鄉張桂軒夫婦處，托他們為其代製幾套棉衣，以趕赴平涼禦寒之用。至回來睡覺，夜已很深，所以扣押槍聲響起之時，蔣鼎文睡意正濃，迷糊之中還以為是局部騷亂，不予重視。繼之人聲鼎沸，有人衝到他所住二〇七室急劇敲門，不意門碎鎖毀，欲開門而不得，士兵以為拒捕，竟向室內連發十數槍。蔣鼎文大聲告知身分，責問何故隨意開槍。宋文梅之士兵即破窗而入，告知張副總司令請的正是你蔣總司令，命其爬窗而出。

對於這一扣押細節，除蔣鼎文本敘述外，同時被扣的郭寄嶠亦有記述：

蔣（鼎文）軍長在這次事變中不敢（肯）出門，假如不是我要求停止射擊，上樓呼叫，他能否在這些野蠻的叛軍長時間亂槍射擊中保有這一條生命，似乎很難說。¹

這次西京招待所被扣的軍政大員有：陳調元、蔣鼎文、蔣作賓、朱紹良、蔣鋤歐（國民黨政府

1 《郭寄嶠口述》，臺灣《傳記文學》第四九卷，第三期，第五八頁。

鐵甲車司令）、蔣伯誠（國民黨中央委員）、陳繼承、蔣百里、薩鎮冰、張沖。¹此外，又找到了陳誠和萬耀煌，邵元沖被打成重傷後送到醫院死亡。在華清池扣押了錢大鈞，在省府大樓扣押了邵力子和「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政訓處長曾擴情以及陝西民政廳長彭昭賢、教育廳長周學昭等，真是將星雲集，謀士成群，文武高官一應俱全。

不多久，張學良和楊虎城來到西京招待所。張學良站在大廳的桌子上，拱手向被扣的軍政大員表示抱歉，鄭重說明這次兵諫絕無傷害蔣委員長和在座諸位的意圖，他們的真實目的在擬就的、向全國發佈的通電上闡述得很清楚。

張學良隨後向大家宣讀了《對時局的通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院、部、會勳鑒，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均鑒：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愛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員警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

1 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五〇頁。

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地迫切待命之至。¹

張學良要求大家在這個通電上署名。根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解放日報》所載，在文電上署名的依次是：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激流。

聯合署名的十九人當中：八人是南京一方的軍政大員；七人是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四人是西北

1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一三—一一四頁。

軍高級將領。而對於非在軍政第一線的蔣百里、蔣作賓、張沖、薩鎮冰等，張學良、楊虎城沒有要求他們在《對時局的通電》上署名。

張、楊的八項政治主張通電全國後，即採取了一系列軍事、政治措施：

一、撤銷西北剿總，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由張學良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董英斌為參謀長。

二、設立幕僚機構，其中的設計委員會研究亟待解決的各項問題，由高崇民、杜斌丞、盧文續、應德田、申伯純、王炳南、王菊人、黎天才等組成，高崇民為召集人；另一個為參謀團，由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孫蔚如、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馬占山、鮑文樾、李興中等組成，何柱國為召集人，負責研究採取軍事措施，收縮兵力至關中東路和西安附近，應對南京政府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

三、改組陝西省政府，解除邵力子省主席職務。由十七路軍總參議王一山為民政廳廳長代理省政府主席職務，以杜斌丞為省政府秘書長、續式甫為財政廳廳長、李壽亭為教育廳廳長等。

四、接收國民黨的《西京日報》和西安廣播電臺。

此外，還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抗日同志會、陝西民眾指導委員會等，以應對當前的複雜局面。同時，他們分別致電相關各方。十二日晨，張學良給在保安（志丹縣）的毛澤東發出一封電報，電文云：

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政府，兄等有何高見，

速覆，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防胡（宗南）敵北進。¹

此刻的張學良，已把中共看做同盟軍，盼他們能提出解決西安事變的「高明之見」。

張學良給南京的正式通電，南京政府遲至十二日傍晚五時許才接到。電文闡述，張、楊的這次兵諫並安全扣蔣，是為了促蔣抗日，並重申了八項主張。事實上約在二個小時之前，南京政府已接到國民黨駐潼關樊崧甫部的報告：西安異動，蔣委員長失蹤。

當日，張學良給蔣夫人，也是他的好朋友宋美齡發出了公私兼顧、兩情相宜的電文，告訴宋美齡他發動此次事變的宗旨以及保證蔣的安全，歡迎宋美齡到西安來洽商相關事宜。電文云：

蔣夫人賜鑒：

學良對國事主張，當在洞鑒之中。不意介公為奸邪所誤，違背全國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國之人力、財力，盡消耗於對內戰爭，置國家民族生存於不顧。學良以待罪之身，海外歸來，屢盡諫諍，率東北流亡子弟含淚剿共者，願冀以血誠促其覺悟。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伏思為國家、為民族生存計，不帽（忍以）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大義當前，學良不忍以私害公，暫請介公留住西安，妥為保護，促其反省，絕不妄加危害。學良平生從不負人，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敬請夫人放心，如欲來陝，尤所歡迎。此間一切主張，

1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〇〇頁。

元已文電奉聞。揮淚陳詞，佇候明教。張學良叩。文。¹

張、楊刮起的西北旋風迅速傳遍國內外，各方的反應同樣迅速回饋到這股旋風的發源中心。

就南京政府而言，迅即形成了主戰、主和兩派，且兩派的高層人物都是高舉搭救蔣介石的旗號。然從力量對比來說，主戰派占了壓倒性的優勢，其中軍中實力派黃埔系將領也一片主戰之聲，胡宗南、李默庵、李延年、黃傑等一百七十餘名青年將領聯名發出通電，懇請中央明令討伐，以申法紀，以固中樞。主和派聲音微弱，幾不能理直氣壯提出自己的主張。直至蔣鼎文十八日到南京申述情況，提出西安、南京切勿再搞分裂的強烈主張後，主和派才漸漸翻過身來。

就各地實力派而言，僅有少部分人擁護張、楊的行動，大多數實權人物紛紛致電張、楊，要求釋放蔣介石，且擔心由此引起全國內戰。

就中共中央而言，當蔣介石成為張、楊的籠中之鳥後，許多領導人的即時反應是「審判蔣介石」，乃至殺掉蔣介石。但是，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冷靜、理智、成熟的政黨，他們在聽取共產國際意見後，一方面覆電張學良，表示支持其抗日義舉，一方面判斷形勢，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進而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提出和平解決的主張。

就國際方面而言，英美明確反對張、楊的舉動，希望南京政府迅速與張、楊和平談判解決；蘇聯對張、楊之舉大聲討伐，希望中共明瞭其意，力求不要動武，和平處理好此事；已侵入中國の日

1 《孔祥熙所藏西安事變期間未刊電報》，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一六一—五一七頁。

本，當然不希望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他們希望中國人自己打自己，進而可坐收漁人之利。

宋美齡收到張學良的電文後，先是「憤甚」，繼而是超乎冷靜的應對。她會同其兄宋子文、姐夫孔祥熙（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代院長）展開了對內說服、對外動用一切手段的和平營救活動。

宋美齡首先想到的是請與張、蔣交誼非淺的端納出面調停。端納是蔣介石的幕賓，也是宋美齡父執輩的摯友。這位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可謂是風生水起，長袖善舞。在作為蔣介石的幕賓之前，端納是張作霖的顧問，張作霖被炸死後，他又做了張學良的顧問。端納還說服張學良戒掉吸食大煙的壞習慣，並陪同張學良赴歐考察近九個月，兩人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無話不談。三〇年代初，端納則作為蔣介石、宋美齡的常客，不時在英美大使館與蔣介石之間傳遞資訊，洽談時事。

因而蔣介石突然被張學良拘禁，端納「不相信少帥會搞兵變，不相信委員長已經死了」。他慨然允諾宋美齡，即刻飛往西安看看實情到底如何。

端納此行，帶有宋美齡給蔣、張的兩封親筆信。在給張學良的信中，宋美齡以女性慣有的細膩，回顧了他們與張學良之間的公誼私交，希望張確保蔣介石的人身安全，不要做有損國家前途、有損友誼的不端之事。

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信，端納先交給張學良，由張學良檢查過目並作了記錄後，再由端納交予蔣介石。宋在信中告訴蔣：東北軍是失地失家的人，有些已家破人亡，他們背井離鄉，身處異地，強烈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對這種愛國愛家的情緒，你應該好好慰撫。而你脾氣不好，心裡的話不肯好好跟部屬講，又不肯傾聽他們的意見，因而激出這次事情。你要為國家為民族保重身體，如有可能和必要她將親來西安。信的點睛之筆是：南京方面戲中有戲。

宋美齡的過人之處就在於她寫給蔣介石的私人信函，張學良看了很舒服，所說的話也是他張學良想說的。然同樣的話，起的作用和效果大不一樣。

端納與張學良作了傾心的交談。張學良再次重申相關主張，表示只要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真誠擁護蔣繼續作為領袖，絕無傷害蔣的任何意圖。端納表示，他能理解張的處境和苦悶，並表示他願意幫助其說服蔣介石。

十四日下午五時許，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端納與蔣見面，面交宋美齡的信。蔣讀了妻子的信函後，對南京的情況有了大致的瞭解；端納進一步向蔣說明，此行是受蔣夫人之托而來，與漢卿洽談後，對他們的動機也有所瞭解。他對蔣說：張等絕無加害您之意，只要您答應他們的抗日主張，他們是真心擁護您作為中國的領袖的。同時他又描述了南京方面主戰派的動向。最後他說：國家和您本人的安危，全繫於您的心思轉念。

端納的一番話，宋美齡的一封信，使蔣介石對事情的判斷明朗了許多，他漸漸對張、楊此舉的用意，對自己的安危程度心中有底。於是他聽從張學良的安排，順利地搬遷至金家巷高桂滋公館，端納也與蔣介石同住在高公館。

張學良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未能和盤托出的擔心總算暫時消除。

次日，端納飛返洛陽，原計劃再飛南京，因氣候惡劣只得滯留於洛陽。端納在洛陽電話報告宋美齡，張、楊並無加害蔣介石之意，西安方面希望南京方面派人入陝洽商。這是宋美齡獲知的第一手真實情況，也是她「發現第一次希望的曙光」，頓使她和平解決此事的信念進一步增強。

然而，南京方面的討伐之聲已湮沒了主和之聲，任宋美齡力阻也無濟於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

員會議在十六日作出決議，由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楊，並由何應欽任討逆總司令。何應欽則任命劉峙、顧祝同為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同時舉行誓師儀式，隨時準備「督率三軍，指日西上」。

西北大地已是戰雲密布，山雨欲來。

宋美齡知道，能驅散這滿天烏雲，挽狂瀾於既發，只有寄希望於蔣介石和張學良了；一旦戰端開啟，不僅蔣的生命堪憂，且中國又將爆發曠日持久的內戰，而這正是日本人夢寐以求的。

於是她急電端納，請他飛返西安，將南京政府準備開啟戰爭之鑰的舉動告訴蔣介石，讓蔣下達停戰手令。

十六日，端納到達西安，他先向張學良說明南京準備戰爭的現狀，其後再次會見蔣介石，轉述宋美齡掌握的情況，同時告知宋美齡的迫切要求和心中的無限擔心。

對於南京方面的動向，張學良還是知曉的，他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解決，既讓蔣同意他們的主張，又不因此而引起內戰；同時他也告訴蔣介石，如果中央軍挑起戰火，他們「三位一體」將奉陪，如果飛機轟炸，既可能炸著我，也可能炸著委員長。他們的本意是希望和平解決此事。

南京方面的舉措、宋美齡的口信、張學良的真誠，國內外的呼聲促使蔣介石醒悟：不能再這樣僵持下去了。

收弦之箭似又握在蔣委員長手中。

派個重要且又合適的使者到南京去溝通已是刻不容緩。

四、一席對話，文動武移

蔣鼎文與張學良、楊虎城兩人還是有些淵源的。

與楊虎城的關係要追溯到五六年前的討伐唐生智之役。那年隆冬，蔣鼎文冒著嚴寒飛雪，率部沿平漢線從南往北攻唐生智大軍，而楊虎城部向東挺擊駐馬店，南北夾擊，致使唐生智主力投誠編遣。至中原大戰的「鄭汴會戰」，在隴海線上，蔣鼎文為右翼軍指揮官，楊虎城配合中央軍攻取隴海西側的洛陽、鞏縣。中原戰事一結束，蔣介石將楊虎城部收編整理為中央軍序列，收編整理的主管是朱培德，蔣鼎文和顧祝同協助。可以說，楊虎城曾一度歸屬於蔣鼎文指揮。

蔣鼎文與張學良的關係並不像與楊虎城那樣是戰場夥伴，然他們卻是流血的刎頸之交。

一九三五年農曆除夕之際，蔣介石召高級軍政人員至廬山集訓，住牯嶺賓館。蔣鼎文與張學良、顧祝同共住一室。張學良自歐美考察歸來，身體比過去強壯多了。三人圍爐夜話，無所不談，顧祝同聽得多，講得少，張與蔣則互相探討，也互相詰辯。國難家仇，始終是個中心話題，每當此時，張學良義憤填膺，悲不能止。有一次，他痛哭流涕地對蔣、顧說：「二位老兄，長此下去，怎生得了。我的部下離鄉背井，深感國恥家仇，要我剿匪，人員損傷，彈藥缺乏，又不補給，我內心的痛楚你們知道嗎？」蔣、顧對他所處的地位，與別人不一樣的國難家仇表示同情，蔣鼎文好言相勸，諍言相告。事後，蔣鼎文特地找到蔣介石，彙報張學良的困惑和惴惴不安，並說張所吐苦水，亦出於實情，然蔣介石不為所動。自此後張、蔣兩人甚為投緣。

蔣介石是一個有毅力之人，對他的部下也如此要求。一次，他下達命令，凡上山學習人員，除

楊永泰年齡較大，熊式輝腿腳不便外，其餘都隨他跑步到蓮花洞，而且速度要快，以測驗大家的體力和意志。其時大雪剛停，山路泥濘，蔣介石已近五十之人，依然在前面健步如飛，眾人不甘落後。蔣鼎文則與張學良挽臂而行，張還手拿一鋼製手杖，適時借力，不意在一急坡拐彎處，兩人速度太快，同時滑跌，張的手杖不慎戳破蔣鼎文的額頭，劃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頓時血流如注，張學良甚感惶恐。這時蔣介石看到蔣鼎文滿面是血，急說：

「喂，銘三頭部出血啦，漢卿你陪他回牯嶺吧，你們不要下山啦。」蔣鼎文不作任何說明，兩人趕忙返回包紮傷口。從此，蔣鼎文的額頭就留下一道清晰可見的傷疤，直至終身。¹

由於原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再加這種不意之中的「流血」之交，兩人的友誼又深了一層。

南京大員們被扣的當日十時許，有人來告，各人多帶禦寒衣服，要作遠行準備，似有送去陝北跡象；而至下午二時許，張學良總務處長周文章又來通知，所有人員仍在西京招待所，對房間作重新分配，蔣鼎文住到原二〇七室對面之南樓一室。這種前後安排的變化，使蔣鼎文意識到事情可能有轉機。下午四時許，張學良來到蔣鼎文住室。張、蔣兩人作了一次甚為重要的對話。

張：「對不起，銘三兄，害你受驚了。」

蔣：「事關國家之事，個人受驚，又算得了什麼。」

張：「對於此事，你有何意見，請指教。」

蔣：「你因國恥家仇，急於抗日，這點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你的想法我早已知道。然蔣先生是否抗日的呢？」

1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一九頁。

張：「當然，蔣先生的日記我亦看過了，他是要抗日的。」

蔣：「你既已瞭解蔣先生要抗日，他的主張與你是一樣的。只不過你認為攘外而內自安，蔣先生認為攘外要先安內，所不同如此而已。然抗日之事，各方面須有充分準備，斷不能倉促從事。我國地廣人又多，民弱國不強，情勢複雜，是否需要蔣先生來領導呢？」

張：「這不用多說，那是當然。」

蔣：「既然如此，有蔣先生在，則有抗日之一日，國恥與你家仇，亦自有報復之一日。如果無人領導，則國恥家仇無望矣。」

張：「你這是什麼話，我們當然需要他領導。」

蔣：「你既然希望蔣先生領導，最重要的是確保他的安全。目前蔣先生和我們這批中央文武官員都做了你的俘虜，但你的部隊在城外，說不定在幾小時之內，連你的安危也成問題，你也可能變成別人的俘虜，那時候你自身難保，再想保證蔣先生的安全就不可能了。」

張學良頓時一驚，像忽然醒悟似的，隨之用手重重地拍了下蔣鼎文的肩膀：「銘三兄，你的話，我明白了。還有什麼？」

蔣：「你的抗日辦法及程式如何？」

張：「組織抗日的政府。」

蔣：「由哪一班子負責？」

張：「我想行政院要宋子文來幹，你看怎樣？」

蔣：「我亦同意。」

兩人交談約二十多分鐘後，張學良離開蔣之房間。¹

蔣鼎文知道張是東北漢子、爽直之人，從這次對話中感到張想和平解決此事，並沒有對蔣介石惡意相向，更沒有「殺蔣」之意。眼下的狀況使張學良陷入騎虎難下的僵局。然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做通張學良的工作，這個局面才可以解開。於是蔣鼎文想到了張的心腹愛將鮑文樾。

鮑文樾是遼寧鳳城人，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二期，為張作霖時的東北軍舊部。他足智多謀，又深得張學良賞識，其時任西北剿總參議，輔助張學良決策相關事宜。鮑文樾係蔣百里的學生，因在軍委辦公廳任過職，又與蔣鼎文、蔣作賓、陳調元熟。在扣押之人中，陳調元、蔣百里都非蔣介石核心圈的人，而蔣作賓是文職，三人相對超然。於是蔣鼎文想動用急公好義、素有孟嘗君之稱的陳調元，當即用名片簡告，函謂：「請速找鮑文樾，托其婉告張，被禁同人中，不乏關心他的朋友，如百里先生與公，不妨物色一、二人作參謀。」

蔣鼎文寫好後，苦思如何將此信帶出，同時又在擔憂張學良的部隊能否穩定住西安局面。

其時萬耀煌將軍的夫人周長臨女士來到蔣鼎文的室內，因為是女眷，看管較鬆，所有扣押之人，只有她可以在西京招待所內自由走動。

蔣鼎文大喜過望，與周女士簡單耳語，將所托之事一一告知，囑其務必完成，周長臨勇敢接受。事後蔣鼎文稱讚周長臨：「萬夫人周長臨女士，處變不驚，機智果敢，終能不負重托，堪稱巾幗鬚。」

¹ 分見臺北《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二一—二二頁，吳相湘《蔣鼎文平亂釋疑》，《民國百人傳》第四冊，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一年版。

眉，可敬可佩。」¹

蔣鼎文所托的兩件大事是：第一，請陳調元或蔣百里設法找到鮑文樾，讓鮑文樾建議張學良，對眼下僵持之事，如感棘手彷徨，去請教陳或蔣，讓這些相對超脫、德高智深人士為他出出主意。第二，現在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西安城內兵力空虛，幾為十七路軍控制，要想方設法命令萬耀煌駐咸陽的十三師向西南漢中方向撤走，與王耀武部靠攏，讓出大道，以便東北軍返回西安，增加張學良部在西安市內的力量和他關鍵時刻的發言分量。

作為史事，要用多家之言互相參證其真實性和可靠性。筆者為此閱讀了大量西安事變的經歷者和參與者，尤其是立場不同的雙方當事人的記述和回憶，以此來多角度參證核實此事。

先說事變當日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一些誤會和亂象。

宋美齡記述：

當日（十二日）天明時，西安城中張學良部隊已為楊虎城繳械，楊氏統制全城，即張學良部下出入城門，亦必先向楊氏領取通行證；張學良部隊在城中者，只有衛隊四千餘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駐守飛機場之防空隊也。其被繳之槍械，至是日下午始得發還。當日並有楊部兵士一隊赴飛機場，初意欲將停留該處之中央飛機，搗碎油箱，擊毀機身，後經愛爾德勸阻，僅傾倒其箱中儲油而去；高射炮皆經封口，嚴禁使用。²

¹ 分見臺北《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二三頁；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臺北《傳記文學》第四九卷第三期第五三頁。

² 宋美齡：《回憶西安事變》，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三四二頁。

申伯純記述：

十二日清晨，與東北軍在華清池捉蔣的同時，十七路軍的憲兵營也按照預定計劃開始行動起來。他們把西京招待所團團圍住，進入招待所各個房間去捉人。當時住在招待所的國民黨軍政大員，計有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陳調元、蔣作賓、萬耀煌、邵元沖、蔣百里等十餘人，連他們的隨員、家屬和衛士們合在一起，共有五六十人……住在招待所的東北方面的馬占山、鮑文樾等人，因為十七路軍的憲兵不認識他們，也一起被押了起來。¹

申伯純，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時任十七路軍政治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後在政協統戰系統任職，後為全國政協常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

楊虎城西北綏署秘書王菊人記述：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楊虎城曾約十七路軍的幾個人，研究如何處理蔣介石的事。

楊先讓大家說。這時有人主張立即殺蔣，理由是：蔣很頑固，他是不會改變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無力抗日，因此不殺蔣便無法實現抗日；鑒於張學良過去和蔣的關係不錯，不殺蔣，難免將來出毛病；不殺蔣，國內各實力派將採取騎牆態度，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都不利；殺蔣，共產黨是高興的，同我們的合作將更真誠；十七路軍內部有的人庇護特務，暗送秋波，為自己

¹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一九頁。

親蔣預留後步，馮欽哉的事已出現了，不殺蔣，難免第二個馮欽哉出來，殺了蔣，就斷了這些兩面派親蔣的念頭，可以鞏固十七路軍內部。立即殺蔣的辦法是以蔣奪槍自殺對外宣布。有人認為殺了蔣無用，放蔣危險，南京政府如不照我們的主張改組，不明確表示抗日態度，中央軍不開到抗日前線，我們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對我用兵，戰事對我不利，我們走到哪裡，便把蔣介石帶到哪裡，也要堅決達到上述目的……有人主張放蔣，但要有保證有條件才放。主要是保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表示堅決抗日。¹

陳誠的說法：

（十二日）午後，自大廳遷入室內，有張部軍官何鏡華來見，問老師尚認識學生乎？余答以想不起來，彼即出示名片，並稱曾在廬山受訓。余當即詢問委座何在，現在安否？

彼稱委座已在驪山尋到，身體平安，現住新城大樓。余聞委座安全之訊，余心大慰，唯以楊部官兵在旁監視，又不便於詳問。少頃，楊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覺察，即稱一時說話不便，俟有特別消息，再當設法報告。何去後不久，張學良來與余談話……余即告張，其他暫時不談，余要去見委座。張答現在太亂，隔日再說，並隨即起立，說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²

1 王菊人：《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見王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五二頁。

2 陳誠：《回憶西安事變》，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第三七四頁。

說明事變之時，場面確實紊亂，連東北軍的要員也被誤扣，且十七路軍對東北軍時有提防，還繳了他們的槍械。楊虎城找部下研討對蔣介石的處理意見，避開張學良，不與張學良同步。對這些張學良焉能不知，故答陳誠「現在太亂」之句，並非僅是推託，而是另有隱情。

所以，蔣鼎文對張學良的提醒，十七路軍對東北軍的一連串有意無意之舉，使張學良感到局面有可能失控，他要儘快地將蔣介石和所扣中央大員遷入到自己部隊所能控制之安全區域。為此，張將楊部孔從周旅調至城外，城內警備改由東北軍劉多荃師擔任，同時，又要讓寧陝甘的于學忠部向西安靠近。然于部東進，必將與萬耀煌駐咸陽十三師相衝突，為此他要設法讓十三師開走，故而張學良派何柱國、王以哲去說服萬耀煌下令將二十五軍十三師南移，

開放進入西安之通道。但被萬耀煌以本是待決之囚，不便多言而拒絕。萬耀煌局限於其時處境，不可能像蔣鼎文和張學良那樣考慮深遠、全面。

多年以後，萬耀煌將軍夫人周長臨女士打破了長期的沉默，終於把蔣鼎文計勸張學良、智調十三師的實際情況說了出來。她所寫的《西安事變身歷記——補述蔣銘三將軍傳略中「不負重托」的一段史實》發表在臺北《傳記文學》第四九卷第三期，現將相關段落實錄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八時許，王以哲、何柱國來見外子（萬耀煌），他們是保定軍校先後同系同學關係，三人見面，發生爭執。蓋張命令外子之廿五軍調興平，未為二十五軍（十三師為該軍所屬）所接受，因此持張（學良）書面命令，要外子副署，為外子堅拒。在爭吵之中，我即說：「你們談國家大事，我無在此必要。」藉機會出去，守衛不放我出門，王以哲乃囑守衛放行。我先

到辭修先生房中，門口有七八個武裝士兵，辭修先生見我去，大為驚駭，辭修先生問我：「這樣嚴密警戒，你怎麼出來的？」爾後轉到銘三先生房中，這就是銘三先生傳略中所記：「適萬耀煌將軍夫人來」之由來。

我走進銘三先生房中，銘三先生一見面就說：「大嫂來得正巧，我有事托你。第一件事，是帶個便條給陳調元、蔣作賓、蔣百里三位，要他們設法找鮑文樾來，婉告張漢卿，解鈴還是繫鈴人。第二件事是你要設法找人與在咸陽的二十五軍通消息，要他們速開漢中。此間先生們均被監視甚嚴，惟有你是婦女，或者可以乘機做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並且要極度保密，否則楊虎城知道了，絕不放過你。」我說：「此兩事我都無把握，你我都已失自由，不過我可以一試。帶簡函給蔣、陳諸公，可以一試（其實當時已無名片，僅是口頭傳說）。第二件事是二十五軍調動的事，劉經扶先生在開封，似應由劉下令調動。」此時銘三先生說：「大嫂，目前情況危險萬狀，武樵（萬耀煌）兄的軍隊在咸陽，對西安構成最大威脅，可以阻止張、楊的行動，但西安城內是楊虎城的勢力，孫蔚如、趙壽山兩師；張漢卿只有劉多荃一旅，實際也不到一旅。如果楊虎城不顧一切蠻幹，可能漢卿本人也難免，所以要二十五軍離開咸陽，好讓張自己的軍隊于學忠等，進入西安。如果二十五軍阻擋于軍入西安，在西安的人，不但委員長的安全，張無法保全，連他也自身難保。這一危險混亂局勢，他們在外面怎知道，此事你必須盡力為之，否則，後果不堪想像。」我與銘三先生商談後，利用侍候雨岩先生服藥時，乘機將銘三先生所托第一件事，偷偷轉告，以後聽說鮑文樾來招待所探視他們，不知有否談到此事。

下午我利用機會，以重利誘買通監視我們士兵，要他在下班後到花園飯店二十五軍辦事處找

任何一個官或兵來，以便告以後事。由此乃有外子衛士黃青山來招待所之事。十二月十四日上午，王以哲、何柱國又來與外子為副署事爭吵。此時隨外子多年之衛士黃青山突然前來，見我夫婦即放聲大哭，外子責備他沒有男子氣概，我乘機勸阻，俟外子與王以哲等爭執時，我細聲囑咐黃青山：「你今天務必出城，趕到咸陽，轉告盧副軍長，部隊迅速撤離咸陽，開赴盤屋大峽谷，與漢中王耀武連絡。」我申明此為蔣鼎文總司令口頭之命令。

我稍後才知道張漢卿於昨日來看雨岩先生，雨岩先生對張說：「監視西京招待所的官兵，都是西北軍楊虎城的，你要保持自由，不可受人脅制，你對委座及被扣諸人的安全要設法保障。」張說：「正在設法。」

十二月十五日，得知委座已於昨日移居城內高軍長桂滋住宅。西京招待所被扣之中央大員，亦於下午五時，分別移住仁壽里、豐阜里兩處。此二區域，均環繞張漢卿官邸，由張之衛隊營守護，築有工事，戒備甚嚴。楊虎城的部隊很難接近此區域。此乃雨岩先生對張漢卿談話後，張漢卿對委座及中央大員之安全措施。這是銘三先生要我帶給陳雪軒、蔣雨岩、蔣百里諸先生的口訊發生之效果，也就是銘三先生傳略中所謂「不負重托」的第一件事。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張漢卿來仁壽里，對外子說：「二十五軍昨晚突由咸陽開拔南行，恐係劉經扶之命令。」殊不知二十五軍之南下，係銘三先生計謀，我囑黃青山口頭傳達，此乃銘三先生傳略中所謂「不負重托」之第二件事。

查閱《萬耀煌口述自傳》所記此事，內容相同，文字稍異，軍隊調動命令確係黃青山傳達出去。

與此印證的還有宋文梅的憶述：

張（學良）因萬耀煌師已進駐咸陽，怕他們擾亂地方秩序，叫我把萬耀煌帶到新城來。請他去咸陽加以制止。經過一再勸解，他仍不敢去新城。特別是他的妻子，非常執拗，不讓他去。後來經陳調元、蔣作賓等人的勸導，才和我一同乘車去新城……至於昨夜才進駐咸陽的萬耀煌師，因不知底細，聽到西安發生巨變，便倉皇渡過渭河，南遁秦嶺。¹

周恩來十二月十七日向中共中央彙報時亦提到萬耀煌部隊移防之事：「十三師離咸陽經華陽趨漢中。」²

對於這兩件事，西安事變的親歷者，後任臺灣國防部長的郭寄嶠亦有回憶：

陳武鳴（調元）夫人思家至急，時常哭泣，萬耀煌夫人最勇敢，亦敢說話。在這一事變初期嚴重關頭，她曾遵令將駐咸陽萬軍密行南移讓東北軍一部進駐西安，抑壓楊虎城之兇惡手段，對維護蔣公及中央將領安全，頗有功勞，詳情伊另有記錄。³

1 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歷記》，第二五〇—二一五頁。

2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一三頁。

3 臺北《傳記文學》第四九卷第三期第五八頁。

文中所述「遵令」，即為蔣鼎文下達萬耀煌軍隊須移動之令。

對這一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史實為何遲遲未予披露，周長臨女士繼續敘述道：

由西安返京後，銘三先生謂我曰：「此事是否可講出來？」當時揣度銘三先生之意，我以君子約定，極度嚴守秘密，故連外子亦不知道此中曲折，委座既已出險，事情自可公開。當時我以為委座平安返京，乃委座之鴻福，個人所做，微不足道，不值宣揚，以免邀名表功之嫌。故西安事變中此一關鍵，使二十五軍南撤，張漢卿之子學忠等部隊進入西安，「接替西北軍楊虎城各師勤務」，使張能有實力保委座之安全，送委座回京。銘三先生傳略中「不負重托」之曲折，則鮮為人所知，今我以垂暮之年，既經銘三先生「傳略」提起，我亦不必推脫，願公之於世，為西安事變史實，作一補述。

由一個軍官夫人調動大軍，儘管她是奉令而行，但傳出去的話，顯是一個大笑話。南京的國民黨元老多以道學自任，是不允許夫人干政的，即使貴為宋美齡，當時他們在南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應對西安事變，如何營救蔣介石，也因為宋美齡其時不是中央委員就不讓她參加，一度連列席也不允許。

周長臨女士此文發表時，在臺灣軍方位高權重的郭寄嶠尚健在，而且再由郭寄嶠這位親歷者撰文披露這事的真實性，又印證其事的可靠。

如此，從另一方面證明，是蔣鼎文輾轉建議張學良找蔣百里、蔣作賓、陳調元商討西安事變解

決之事，然後才由張學良、蔣百里提請蔣介石派蔣鼎文去南京溝通，這是其一；

其二，蔣鼎文巧妙調走距西安很近的中央軍二十五軍十三師之部，讓其遠離西安，以盡量給張學良周旋留出餘地，以創造和平解決的氣氛和空間。

由於此事較大，筆者繼續找尋這方面史料。果不然，又見到多位西安事變的親歷者和知情者記述此事。這裡選錄四位公開發表的書面文章，一位是蔣介石的侍衛長、同扣於西安的錢大鈞上將，一位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派駐陝西省的特派員、CC派重要成員、中統局副局長郭紫峻，一位是蔣鼎文的參謀長李家鼎中將，一位是時任稅警總團中將司令、後位至臺灣國防部長的一級上將黃杰。

錢大鈞是如此回憶的：

民國二十五年有西安事變，領袖蒙難。不數日，張學良竟幡然悔悟，護送領袖離陝，得力於銘三兄者實多，而銘三兄生前鮮為外人道，亦鮮為外人知。余當時侍從領袖蔣公留陝，親與其難，且遭叛軍槍傷未死，故知之甚詳。變起之日，銘三兄義正辭嚴，面告張學良應以國家安危為重，後由銘三兄奔波於西安、南京之間，繼又迎領袖於洛陽，震驚中外之變，彌平於俄頃之間……西安彌變，幹旋其中，維護領導中心於不墜，青史留名，得能相提並論者，能有幾人。¹

郭紫峻則記述如下：

¹ 錢大鈞：《悼念蔣銘三兄》，見臺灣一九七六年印行《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四頁。

雙十二變時，公（指蔣鼎文）防危於萬慮叢錯之傾，杜變於事機倉猝之會，公之過人識見，姑不置論，其所貢獻於領袖國家者，何言勝哉！而張學良對公之所以傾心信賴，虛心相從，皆以公推誠於人……紫峻在陝任陝省黨務特派員，十二日晨，槍聲甫停，則由友人掩護，乘其貼有新通行證之汽車，並化裝為楊部軍官，至新城，繞行一周，證實領袖確在新城，立即換車到渭北馮欽哉將軍軍部，與中央取得聯絡後，遂即遵命經洛陽飛京，並秘密列席中常會報告西安情況，所建議者：第一、先設法將委員長遷至張學良防區；第二，力主夫人與宋子文先生至西安。奈人微言輕，中央未能立決，初不知公（指蔣鼎文）已轉乾坤於先矣。其後夫人與宋子文先生之赴西安，乃張學良先使公返京片言而決也。¹

李家鼎追記道：

西安事變，（蔣鼎文）將軍於危機一發之際沉著應變，首曉張學良以大義，並警之以利害，俾確保領袖之安全。繼則多方策動，打開危險僵持之局勢。嗣於飛京磋商善後之時，提綱挈要，貢獻當局。乃復飛西安迎接領袖以出險。此事之回天有術，出於將軍之籌畫運用十居七八，至個人利害安危則從未計及。此次經過即局中人亦未能知其詳也。²

¹ 郭紫峻：《蔣上將銘公的宏毅精神》，見《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八七頁。

² 李家鼎一九五四年撰《蔣銘三六十年壽辰序文》（印行本）。

黃杰的文章為：

當西安事變作，公（指蔣鼎文）亦陷危城，一時疑囂四播，不可終日……而公與叛帥（指張學良）相周旋。動之以利害，曉之以道義，速其猛悟。未曾辭鋒鏑、計禍福，其效忠領袖之至誠，是可為後世法也。¹

期圖改變一種傳統說法，須有扎實且可靠之史料，多人多角度的佐證。盡管以上這種寫法或不符合傳記體例，但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故只能以這種史料排比且多方面多角度考證的方法寫下來。還有詳細證據下文再將提及。

五、肩負張學良、蔣介石重托

蔣、張已默默達成要派特使去南京的共識，現在的問題是派誰去，誰能擔當這一特殊使命。

事實上，在這之前，張學良已向蔣介石提出，他打算派蔣百里去南京調停，但蔣介石沒有答應。蔣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寧人。在日本、德國留過學，學習軍事，回國後出任過陸軍大學校長，為著名的軍事理論家，無黨派人士，時任中央軍委會高等顧問。十二月十一日，他應命趕到西安，向蔣介石彙報從歐洲考察歸來的感受和想法，下榻於西京招待所，適逢西安事變爆發，不知不覺間與蔣鼎文、陳調元等人同時被扣押。

¹ 黃杰：《師門記往》，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八頁。

蔣百里對南京當局在情況未明下就貿然大兵壓境、大施討伐的做法頗為不解，現在張學良主動請教於他，並央他去見蔣介石，便慨然允諾下來。

十二月十六日傍晚，蔣百里在張學良的陪同下來到了高桂滋公館。百里先生進去後，蔣介石面帶笑容，欠身握手，並請百里在旁邊的沙發上就坐，雙方就噓寒問暖起來。張學良見「二蔣」談得融洽，知趣地起身，掩門離去。

見張學良離開，蔣百里便與蔣介石轉入正式話題。蔣介石對百里先生說：「漢卿的意見，他想派一個人去南京商談，他心目中所派人選是您。我既沒有答應他，也沒否定他。您看呢？」

話還沒說完，蔣介石就在注意蔣百里的神情。

對於蔣介石這番話，蔣百里有點猝不及防。因為在這之前，張學良並沒有告訴過他曾向蔣介石推薦他去南京調停之事，也沒有告訴過他蔣介石事實上已否定了蔣百里作為調停人，張學良更沒有告訴過蔣百里，請計於他還是蔣鼎文提出的建議。

百里先生清楚蔣介石的韜略和處事方式，旁人提出來的人選他如果認可，會作肯定的表示；如果不認可，他不會做否定的表示，而是默不作聲，讓你自己揣摩。如果蔣介石此時發出否定的聲音，張學良可以瞭解到「二蔣關係」的微妙，以及他本人受器重和信任的程度；倘若張再把這個「否定」轉告給蔣百里，會使「二蔣」陷入尷尬，事情趨向複雜化。特別是現在的境地，蔣介石出言會更謹慎。

百里先生是何等聰明的人。對蔣介石的徵詢他馬上作出了回答：「委員長，目前西安、南京互相猜忌，這樣僵持下去，於國於民都不好。我贊成漢卿的意見，派個人去商談一下。」

蔣介石對他的意見表示認可。

百里繼續說道：「至於所派人選，承漢卿看重，我心領了，但近來身體微恙，再加本人與黨國關係不深，去了不但於事無補，更重要的會失去溝通協調的好時機。」

蔣介石問道：「您的意見呢？」

百里接著說：「我認為去的人，既要對蔣委員長忠心不二，又要為張漢卿所認可，眼下的事實，南京方面所信任又為首要，說出來的話要有分量，還要能堅持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解決問題。」蔣介石聽後作點頭狀，隨之沉吟不語。

其時張學良推門進來，張、蔣兩人見蔣介石已失去繼續談下去的興趣，便告別而去。

蔣與張相偕而出。蔣百里對張學良略有不快，他覺得剛才有失尊嚴，又覺得張學良對他未講實情。張學良見蔣百里有所誤解，便將蔣鼎文先前對他講的話，以及蔣鼎文讓他請教相商之事原本本告訴蔣百里。蔣百里聽後，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有的不愉快也瞬間消失。

按照當年陶菊隱所著《西安歸客談》，張學良、蔣百里兩人是這樣對話的：

「你是否有打破僵局的誠意？」

「您怎麼懷疑我沒有誠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為您是無黨派色彩的軍界老前輩。」

「事前何以不同我商量？」

「想您見過委員長再告訴您。」

「我去南京接不上頭，最好派一個能代表委員長的軍事大員前去，才有辦法。」

「您看誰好？」

「留在西安的軍事大員之中，你最恨的是誰？」

「我不恨什麼人，只有蔣銘三（鼎文）這個人好出壞主意，我就是看不順眼。」

「那麼最好派銘三去。」

「這是什麼道理？」

「派一個最不喜歡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絕無傷害其他中央大員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對和平解決時局抱有極大的誠意，這樣，就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

「很好，我不但同意派他去，同時還想請委員長寫一道停止轟炸西安的親筆手令交他帶去。」就在這一天，張又去見蔣，把他同意派蔣鼎文到南京以及帶親筆手令的話如實彙報。但是，此後又發生了兩個新的問題：第一，蔣怕親筆手令落在張的手裡，傳出去將成為一樁笑柄，因此不肯寫；第二，百里主張把親筆手令直接交給蔣鼎文，張又怕兩蔣關起門來講私房話，對他不利。直到第六天（十二月十七日），又是百里出主意，叫張陪同蔣鼎文去見蔣，蔣直接把手令交給蔣鼎文，即同時退出（二蔣並未單獨談話）。問題解決後，蔣鼎文當天從西安飛往南京，南京政府當天將此令製成珂羅版，送往京滬各報發表。

由於陶菊隱先生在新聞界的地位以及他的傳神之筆，再加上素材由採訪當事人蔣百里所得，所以是蔣百里推薦張學良「不順眼」的蔣鼎文到南京去傳令，似乎已成主流說法，而原先的「不順眼」

亦被好事者演繹成「討厭」和「可恨」了。

隨著海內外關於西安事變的史料和當事人往來電文的不斷發掘披露，對蔣鼎文是張學良「不順眼」人的這種說法，足可否定，可以說是完全本末倒置。對此，下文將專章談及。

派誰去南京合適？這是蔣介石、張學良都在思考的問題，這個人選的條件，蔣百里與蔣介石在交談時實際上已點明，除所遣者本人需要豐富的閱歷和資望外，張學良要認可，蔣介石要首肯，更重要的是當時南京掌權者要接受和信任，這四者之間缺一就不能擔此重任。

端納是「當時被認為溝通南京與西安之間最適宜的人物」¹。端納與蔣、張之間的交誼不用多說，資歷也足夠，但他不居政府的要職，外界普遍認為他是蔣介石的顧問。但蔣宋夫婦始終認為他僅僅是家中的客人，而不是他們的顧問。所以，如果派這樣一個外國人去南京，無疑是鑿枘相碰。

蔣百里當然德高望重，智謀絕倫，但他的不足，他自己也說了，「與黨國關係不深，於事無補」²。蔣介石對他素來尊而不親。

蔣作賓為外交長才，軍事內政非其所長；錢大鈞是軍政好手，然每臨大事寡斷，張學良認為他是「一根油條」，且受傷在身；「二邵」（蔣此時尚不知邵元沖已死）均係文職，不掌兵權，話語分量有限；衛俊如武之合格，文之欠足，且其近來與紅軍暗通款曲，不知心中到底作何想？朱紹良位高權重，唯稍顯木訥；陳繼承威望不足，陳調元非黨國正宗，而萬耀煌與張學良剛剛認識，似不足論矣。

1 陶菊隱：《蔣百里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2 陶菊隱：《蔣百里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陳誠，當然是人才，派他去，無論是才幹、資望還是忠心，沒話說，論左右協調，揮袖起舞，現在西安諸人中無出其右者，然眼下的張學良對他不相信，留京的何應欽與其不睦，讓陳誠去，張學良不會同意，就是讓他去，何應欽能不能幫他理順現時亂象，亦殊為難料。

如此，這個赴京的人選當非蔣銘三莫屬了。

對於蔣鼎文的忠誠已不用懷疑。蔣與張學良雖未有過多的交往，但此前，兩人在廬山同處一室，圍爐夜話，共吐心曲，至後來張學良在蔣鼎文面前竟無所顧忌地痛哭失聲，其後二人幾近刎頸之交，在他面前兩人也各誇對方所長。蔣鼎文還特地在蔣介石面前說，要同情理解張學良急迫抗日的心境。蔣介石派蔣鼎文出任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一方面是考慮到他能儘快完成剿共任務，另一方面也考慮到「蔣鼎文與張學良相處投機」。¹論當時所掌職權，蔣鼎文是中央執委、國防會議委員、二級上將，可謂手執兵符，位高權重。重要的是，蔣鼎文與何應欽關係不錯，與劉峙、顧祝同資歷、權位、功績在伯仲之間，在交情上，他們可以互相「罵娘」；還有對於黨國的元老戴季陶、居正、孔祥熙、丁惟汾、孫科、宋子文等，他關係都不錯，有時還能犯顏直諫。此次雖有蔣介石本人下達的停戰命令，但對命令的落實情況，各位大員之間的協調溝通，尚需要所派之人去應對說服；所說出的話要擲地有聲，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被人所左右。

事實上，張學良心中的最佳人選也是蔣鼎文而非蔣百里。

前一天，何應欽電告張學良，希望他在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中選一人去南京，商量西安、南京之事；兩天前，張學良在看望陳誠時，張學良就告訴陳誠，他準備派蔣鼎文赴南京協調與西安

¹ 參見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四冊：臺北《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二一頁。

之事。至於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提及派蔣百里去，尚有試探之意，果不然被蔣介石柔性地斷然拒絕。蔣介石自然比張學良想得更深，對南京政治生態的熟悉，更非張所能企及。

這是蔣介石被扣後第一次與張學良在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

且看蔣介石十六日、十七日《西安事變半月記》的記載：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張來見余形色蒼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將此間之委員會說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內可送委員長回京；但中央空軍在渭南、華縣等處，突然轟炸進攻，群情憤激，故昨夜之議又將不能實行矣。奈何！午後，端納自洛陽回，知洛間軍事仍在進行……」是晚，張同蔣百里先生來見余。百里先生於事變前適來陝，同被禁於西京招待所者。為余言：「此間事已有轉機，但中央軍如急攻，則又將促之中變。委員長固不辭為國犧牲，然西北民困乍甦，至可憫念，宜稍留迴旋餘地，為國家保持元氣。」再婉請余致函中央軍事當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陝，囑勿遽進攻，且先停轟炸。」余謂：「此殊不易做到。如確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則余可自動去函。囑暫停轟炸三天，然不能由張要求停戰，則中央或能見信；如照彼等所言須停止七天，則明為緩兵之計，不特中央必不能見信，余亦決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謂：「當再商之，總預派一人去傳述消息。」

洛陽、南京的軍事動態蔣介石已心中有數，現在要停火談判不是你張學良提出來的，而是我蔣

某人首先向南京發出的聲音，這樣才會有效果。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張又約百里先生來見，謂：「張（學良）意即請照委員長之意致函中央，令軍事當局在三日內停止進攻，並請派蔣銘三攜函飛洛陽。」余可之。旋銘三來見，余乃親函敬之，囑暫停轟炸三日，至星期六日為限，付銘三攜去。午後，張又來見曰：「此事甚多轉折。現在不問如何，先派銘三飛洛通信，餘事再議。頃已送銘三上飛機赴洛矣。」余乃知前方進攻必甚急。而謂張「餘事再議」一語，則知其又為日後延緩遷宕之伏筆，然亦聽之而已。

此行只有派蔣鼎文去，蔣介石才會如此爽快同意張的提議：「余可之。」對於南京之行，蔣鼎文作為當事者也有回憶：

十六日傍晚，張（學良）在豐阜里百里先生處，派總務處長周文章來邀往晤。既至，張謂擬請先回京一行，余曰只要有益大局，且得委座命，任何使命，在所不辭。張謂擬不日恭送委座還京，但須先有人傳令停戰，並已陳明委座，請明晨一同謁見。是晚，余宿豐阜里，並先電陳請飭前線暫停火勿前進，其餘次日前來面報。

豐阜里與蔣鼎文現所住的仁壽里七號其實不遠，都在張公館附近的玄鳳橋。蔣鼎文他們是在十五日傍晚按照張學良的安排遷入這裡居住的。

是晚，蔣鼎文輾轉難眠。因為自從十二月十二日被扣後，除了張學良與他作懇切探討外，還未有其他人與之作充分的交談。同扣的人不允許互相走動，他們之間的些許交流還是在上廁所之時。後來，連小便之時也有監守者跟在後面，「廁間交流」被迫中止。現在他們的最大苦悶是消息閉塞，無人交談。此身已非自由人！

對於蔣百里先生，蔣鼎文並不陌生，且還結識很早。民國元年，蔣尊簋出任浙江都督時，即聘任蔣百里為總參議；而當蔣百里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時，又聘任蔣尊簋為主考官。通過蔣尊簋的介紹，蔣鼎文與蔣百里相識相知，而蔣百里對蔣鼎文所展現出來的軍事才能也刮目相看。

是晚兩人同室而居，可以暢盡其言。然而，對於西安城內外的情況，蔣百里也比他知曉不了多少。

十七日上午，蔣鼎文在張學良的陪同下來到蔣介石的住處，「二蔣」如此相見，自是有許多話要說，然在此時，他們各自克制，不作感情上的流露。蔣介石潑墨展毫，蔣鼎文隨侍桌旁，看到他一筆一畫寫下致何應欽的停戰文字。未幾，蔣介石把思索過多遍的腹稿很快展現在信函上。停戰令是這樣寫的：

敬之吾兄：

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於本星期六（十九日）日前可以回京。

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十二月十七日¹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細節，正在蔣介石書寫之時，張學良出去了一下，在這瞬間，蔣鼎文急趨前一步，對蔣介石細語：「我想要子文來，他們是乾親家。中央若無人來，我仍回來。」蔣介石忙說：「好啦，好啦，你出去。」並以目示意，免張學良起疑心，又橫生枝節。²

蔣介石寫好後，又讓張學良過目停戰令內容，以便讓張心中有數，然後取出信封，寫上收件人姓名，交給蔣鼎文。蔣介石又當著張學良的面，向蔣鼎文簡單講了幾句注意事項，旋之，張學良和蔣鼎文同時退出。

張、蔣辭別後，同回蔣百里住處。正當其時，張學良接報，楊虎城不願蔣鼎文飛赴南京。張學良連忙趕到楊虎城處說明情況，一直磨蹭至下午方回，似亦無說通的跡象。張學良頗有不快地對蔣鼎文說：「銘三兄，我們走，不管他。」

然而，蔣鼎文此時還飛赴不了。

原來，中央軍的飛機又來轟炸了，此前中央軍已對渭南、三原轟炸多次，地面部隊開進潼關，進逼赤水，而今天飛機對三原的轟炸，密度又頻於往日。

張、蔣所不知道的是南京在這一天上午召開會議，正式通過討伐張學良、楊虎城的決定，對張、

¹ 李仲明：《何應欽大傳》，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五九—一六〇頁。

² 臺北《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二四頁

楊的軍隊準備開火了。

蔣鼎文連忙給何應欽發了一份緊急電報，電報云：

文正預備起飛時，聞空軍轟炸三原，又生枝節。委座面諭、手令均令停止一切轟炸衝突，務望迅飭全線陸空軍遵令辦理，餘俟文到京後面陳。¹

蔣鼎文對南京「又生枝節」的行動頗為不滿。事實上，昨天張學良、蔣百里鄭重告訴他：他們與委座商量決定，派他去南京斡旋傳令，並攜帶委座的停戰手令。蔣鼎文獲悉此情後，就提前在深夜致電何應欽，告訴他們西安這裡的意見，並讓他們暫時停火。

蔣鼎文凌晨之來電，何應欽在十七日上午的南京中常會議上作了報告：今晨四時，接蔣鼎文（西安）來電，謂將奉委員長手諭，即日來京，並囑前方勿轟炸。何（應欽）本人已同意暫停轟炸。²為免意外再次發生，張學良自己駕車送蔣鼎文到機場。在車上，張學良告訴蔣鼎文，同時讓他也轉告南京政府：

第一，西安城內依然是青天白日，並無紅旗懸掛；

第二，邵元沖先生夫人處，請你上門致歉。現暫告在醫院養傷，到時我再上門謝罪；

第三，中央諸位同仁，請代為問候。

1 李仲明：《何應欽大傳》，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五九頁。

2 左雙文《西安事變後的南京討伐派》所引史料，《近代史研究》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在登機時，蔣鼎文又向張學良叮囑：「漢卿，凡事定下後須堅定不移，萬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南京的情況我會及時告你。」

張學良答道：「銘三兄，一切請放心。」

上機時已近下午五時許，專機由張由谷大隊長駕駛。是日天氣惡劣，抵達洛陽時，天氣極暗，不能續飛。而當時機場照明設備不足，飛機還是依靠木柴燃燒，才導航降落。

蔣鼎文未及吃飯和休息，急忙電話報告宋美齡、孔祥熙和何應欽，除將西安的情況、蔣介石的手令說得更詳細一些外，還述說了天氣惡劣不能直接飛往，明早上午面報云云。

蔣鼎文與東路軍總司令劉峙也通了電話，瞭解到東路軍隊的部署情況，蔣順便告訴劉峙，委員長下達了停戰手令，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並作委婉的示和勸解，蓋因劉、蔣關係非同一般。

蔣鼎文對南京其時的複雜性還真是瞭解不深。南京的要人們，可謂人言各殊，輿情洶湧，群龍無首，各行其是，一度連軍事行動都幾乎失去了控制。

南京當局自十二日深夜緊急會議後，又連續開會，會議主旨當然是商討如何解決西安之事，十二日作出的決議是這樣的：

「張學良十二日通電叛國，殊深痛恨……以身為軍人，竟冒犯長官，實屬違法蕩紀。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

這天的決議並沒有提到要對張、楊進行軍事討伐，僅僅是對張學良職務的剝奪。可手執兵符的參謀總長朱培德竟棄中央的決議而不顧，自行頒發命令，在天上用飛機轟炸，在地下用軍隊進逼。這個實情直至戴季陶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朱培德去世時才透露：「余主張立下討伐令，（中央）至

十六日始見明令，在決策未定時，朱（培德）先生已出動空軍轟炸張學良部隊及軍火車一列，一面電令洛陽（祝）紹周所部，開入（潼）關。」¹

軍事行動整齊劃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今在同一政黨內的「戰爭行為」，竟在中央通盤「決策未定之時」就立體地開始了，即連主戰派的戴季陶也有點不好意思，由此可見其時南京政局的紊亂程度。

十三日，宋美齡、孔祥熙趕到南京，即勸誡各位大員，西安之事應明瞭情況後再作決定。在接到端納報告西安實情後，宋美齡又及時與各位要人周旋，力主和平解決。然其時南京的政治生態，任憑宋美齡言之鑿鑿，乃至聲淚俱下，各位大員依舊「大義凜然」，不為所動。

陳公博對主戰最力的戴季陶有個傳神的描述：

有一次在中央軍校開會，蔣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發脾氣，痛陳不能和張、楊講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他那時對於張、楊，大有「與漢賊不兩立」之勢。到了十六日開中央政治會議之時，更大聲疾呼，主張聲罪致討，說到大義凜然之時，不惜大拍桌子，以補其聲淚俱下之不足。戴季陶不僅斥責何應欽，對孔祥熙也是毫不客氣：「孔庸之自然跟著蔣夫人主張和平解決的，因此給季陶大罵一頓，連連謝過不遑。庸之先生本來在會場上素來是盛氣凌人的，或者因蔣先生被困西安，沒有靠山罷，那時真是低聲下氣，變了一個寬容大度的謙謙君子。連那位平日佻佻倜倜的居覺生院長也乘時主張正義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

1 左雙文《西安事變後的南京討伐派》所引史料，《近代史研究》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嗎！」¹

可見，即使是宋美齡這樣的強人，這樣聲勢鼎盛的家族，在蔣介石被扣後，她主和的聲音也幾被南京中樞洶洶的主戰浪潮所湮沒。

十二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作出了《討伐張學良的決議》：

關於處置張學良叛變：一、推何委員應欽為討逆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民政府下令討伐；三、推于委員右任宣慰西安軍民。

同日，國民政府下達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文字如下：

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著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此令。²

十七日，何應欽即通電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之職，同時任命劉峙為東路軍集團軍總司令，由河南

1 左雙文《西安事變後的南京討伐派》所引史料，《近代史研究》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2 《中央日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洛陽一線西入潼關，作進攻西安之準備；任命顧祝同為西路軍集團軍總司令，由寶雞、咸陽之間東圍西安。劉峙之部在這前後已迅即部署，急令駐陝縣之第七十一軍軍長樊崧甫部速占潼關，電令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將駐洛陽的原東北軍的重炮旅予以繳械；委徐庭瑤為東路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進駐潼關，指揮洛陽以西各部向華縣集結。西安已處於幾十萬大軍東西兩路的鉗制圍困中。

蔣鼎文就是在這樣的濃重戰雲籠罩之下，踏上東去南京之路。儘管懷揣「天子之令」，但此時在所謂的中央決議面前，他是否能挽狂瀾於既倒？

對於蔣鼎文出使南京，中共中央投入極大的關注。周恩來甫到西安，即致電毛澤東和中央：「蔣鼎文今早放出，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毛澤東即密電周恩來，要他設法打聽，為何要釋放蔣鼎文。

消息靈通的《大公報》在十八日刊出中央社專電：「聞張學良擬請蔣鼎文出而（面）奔走，但據此間觀察，此在張或別有作用。」

六、「和戰」陣營，天平傾斜

蔣鼎文十八日上午從洛陽起飛至中午到達南京。蔣鼎文萬萬想不到的是，他飛機剛一落地，就碰到了一件讓他十分為難的事情。

原來「戰」與「和」雙方的核心人物都想先見到蔣鼎文，都想急切知道蔣介石的真實處境和張學良、楊虎城的真正意圖。

在十七日國民黨中常委會議上，當何應欽轉達蔣鼎文凌晨來電，他將持委員長停戰手令飛京

報告時，主戰派居正和孫科表現反常。據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銓敘部次長，也是中央常委會議記錄者王子壯記載：居正、孫科「均有極激昂之表示，以為此種電報在蔣先生不自由之期間，均為小張（指張學良）所弄虛玄，現在唯一的出路，迅速以大軍包圍西安始有講話餘地，在蔣先生沒有恢復自由以前，一切命令均應認為無效」。¹甚而把蔣鼎文所發給何應欽的電文，看做可能是張學良在操弄蔣鼎文所致，是張之「所弄虛玄」，在此情況下即或是蔣介石發出的命令也應視為無效。

當國民黨中央作出討伐決議後，何應欽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將「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²。孫連仲、湯恩伯、王仲廉等在《中央日報》上請令討伐。顯然，在什麼時候向西安進攻，何應欽就有決定性的發言權，所以當十七日晚間蔣鼎文來電告知將於明日到京之後，何應欽口氣頗重地告訴蔣鼎文：「明天我在家等你，什麼地方都不要去，先到我家。」³

據復興社重要成員康澤敘述：「何應欽在家中忙著組織成立所謂討逆軍總司令部，臨時抽調若干親信幹部擔任各級幕僚，以軍委會銓敘所所長林蔚任參謀長，軍委會高級參謀徐培根為參謀處處長，以參謀本部第一所第三處處長錢貽士主管後勤等等。據林蔚說，何應欽率上述主要人員對西安軍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闔眼，其興奮度已達最高點。何估計蔣（介石）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殺害的可能極大。」⁴

1 《王子壯日記》第三冊，轉引自左雙文《西安事變後南京討伐派》。

2 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轉引自李仲明：《何應欽大傳》，第一五七頁。

3 蔣干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北《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作者為蔣鼎文族侄。

4 康澤：《西安事變後南京情況》，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二七〇頁。

何應欽將根據蔣鼎文帶來的第一手情況，權衡開火問題。

主和派是宋氏兄妹，宋美齡在十二月十三日甫到南京，即與何應欽發生激烈爭吵，宋認為你們這樣飛機轟炸，會把「委員長炸死」；何應欽說這是中央的決定，你宋美齡不要干預國家事務。為此宋美齡「焦慮奔波，困憊更甚」。她奔走呼號，尋求同盟者，然除了孔祥熙等以外，應者寥寥。「余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彌漫之重圍中矣。」更為可慮的是，當十七日端納電告南京「委員長已遣蔣鼎文主任飛京，攜其親筆致軍政部長函」以後，「不料政府中人聞訊，聲稱彼等不獨不願與西安作談判，且亦不願在委員長離陝前接受任何命令，蓋此書即出委員長手，又安能確證其為出於委員長之本意者？諸公竟測其領袖將屈服於劫持之下，寧不可異？」¹

所以，當蔣鼎文在洛陽電告宋美齡將在次日抵達南京後，宋氏兄妹也急於瞭解來自「危城西安」的狀況，兄妹兩人決定去機場接機。

而何應欽在電話上囑託蔣鼎文先到他家後，心中依然不踏實，他又布排了高明的一著。由此，讓蔣鼎文無所措之的事情就發生了。

回來再述，當蔣鼎文走下飛機後，第一個迎上來的是他的堂叔蔣伯誠，握手之機，蔣伯誠說：

「銘三，你平安回來就好。西安的情況，何部長在家裡急於聽你彙報，上車吧。」

不等蔣鼎文回答，這邊宋子文也趨身向前：「銘三兄，你受驚了。大致情況我們已經知道。夫人在車上等你，我們回去慢慢聊罷。」宋子文一手拉著蔣銘三，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向他的車子走去，蔣鼎文不知不覺間便上了宋子文的車。

¹ 宋美齡：《回憶西安事變》，李立編《親歷西安事變》，第三四三頁。

任憑蔣伯誠足智多謀，此時的他也不知怎麼好，他已無法完成何應欽交派的把蔣鼎文先接到何公館的任務。

由於此舉，蔣鼎文與蔣伯誠、何應欽都發生了誤會。¹

對於蔣伯誠的威望，不僅僅是蔣鼎文，當時的同仁，即或連蔣介石也把他看做是「智多星」。蔣伯誠既是蔣鼎文族叔且還是他戰場上的救命恩人。蔣伯誠祖上從盤山遷至三四里外的湮浦村後，他們就在該村定居下來，但宗譜、宗祠都在盤山，故又稱蔣伯誠為盤山人。

蔣的父親蔣任山是當地有名的私塾先生，除蔣伯誠從軍以外，其弟弟蔣志英也投筆從戎，其後曾任職浙江海門少將防守司令，一九四一年因抗擊日軍而壯烈犧牲。

蔣伯誠在杭州師範學堂畢業後，旋入蘇州武備學堂，畢業後，一度到保定軍官學校出任教官。蔡鏢在雲南舉反袁義旗，蔣伯誠取道越南，趕赴昆明響應，參加護國戰爭，繼投奔孫中山的大元帥府，自此後就與蔣介石熟悉起來。

第一次東征時，黃埔教導團隨粵軍出征，粵軍總司令為許崇智，參謀長是蔣介石，而粵軍第四師的參謀長為蔣伯誠（即許濟所在的原第七旅），他們合力擊潰陳炯明。當北伐開始，蔣伯誠出任何應欽第一軍參謀長，從東線自粵入福建、浙江，會同何應欽，將原屬孫傳芳的周鳳岐、陳儀所部收編為北伐軍，壯大了東路軍的聲勢。其後，蔣伯誠對浙江的軍政進行整頓，任職浙江省府委員、浙江省防軍司令、杭州市代市長、浙江軍事廳長等職。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到浙江時，主浙的周鳳岐對蔣介石下起逐客令，蔣伯誠遂與何應欽一起，將周鳳岐趕出浙江，由何應欽出任浙江省政府主

¹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北《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席，蔣伯誠代理實職。

蔣伯誠積極為蔣介石東山再起蓄積力量。蔣介石在杭州盤桓時，「二蔣」無話不談，他們商量決定，將一批血氣方剛、有培養前途的黃埔一期生送到日本去學習軍事。因蔣介石是在野之士，而具體經辦的官方人士則是蔣伯誠，他以浙江省防軍司令部的名義為這批人辦好出國手續，這批送出去的青年才俊有二十二人，其中有宓熙、宋希濂、竺鳴濤、潘佑強、葛武榮、周天健、彭孟緝等，歸國後大多成為風雲人物、高級將領。

張學良東北易幟後，蔣伯誠作為蔣介石所派中央代表，成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後改名為北平政務委員會）的成員，主席是張學良，委員有韓復榘、蔣伯誠等。蔣伯誠同時又是蔣介石派駐韓復榘處的委員長代表、軍事聯絡員，常駐濟南。對於韓復榘這種有實力的區域武裝，蔣介石既想用，又在防，如何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度，蔣介石認為蔣伯誠是不二人選。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還在「兩廣事變」籌畫時期，蔣介石即遣對廣東熟識的蔣伯誠赴粵。到了廣東，蔣伯誠可謂如魚得水，陳濟棠部的許多將領有些原是他的左臂右膀，有些則是他的下級官員。蔣伯誠潤物無聲，既打感情牌，又用銀彈票，說出的話語、分析出來的道理令人折服，然他對國民政府的忠誠，對蔣介石思路的貫徹，堅守心中，絕不含糊，不做任何退讓。很快，「兩廣事變」在軍事壓力、內部離間的兩手進攻下，陳濟棠龐大的集團竟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分崩離析。對此，「兩廣事變」的主要參與者李宗仁，在三十年後的《李宗仁回憶錄》中對蔣伯誠還心有餘悸：

不料中央謀粵已久，反間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運動」的發動，正予蔣氏以打擊陳濟棠

的機會。先是，自「非常會議」之後，蔣先生即派蔣伯誠為代表，常住廣州。伯誠是個老官僚，善於應酬，與濟棠的部屬過從極密，乘機大施反間之計，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空軍司令黃光銳都和蔣伯誠有勾結。「六一」之後，蔣伯誠在反間上所用款項多至數百萬。果然「銀彈」效力甚大，七月四日空軍司令黃光銳突率飛行員四十餘人，分駕飛機數十架，飛投中央。七月中旬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赴港休養。七月十三日南京軍委會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遺缺由余漢謀升任。余在粵北防地立即通電就職，並聲明率部回廣州。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乃於十七日晚間十一時約我到其官邸一晤。見面之後，濟棠便說如今大勢已去，他決定一去了之，並勸我回廣西緩圖善後。

在蔣介石手下能使對手在「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人物，屈指算來也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何成濬，湖北人，老資格的軍人，常年駕馭一支部隊，他在二、三〇年代為蔣介石吸納消化了不少雜牌部隊；一個就是蔣伯誠，他往往是以蔣委員長特別代表名義，單槍匹馬與你頻頻周旋，與你把盞歡笑，與你傾訴衷腸，亦友亦誼，亦攻亦守，喜怒哀樂都可與你同步，當對方意識到時，已不知不覺上船，然他們並不怨恨蔣伯誠，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手法，蔣伯誠可謂得心應手。

蔣伯誠自從離開軍界第一線後，已經為蔣介石立下了輝煌戰果——逼走周鳳岐，籠絡張學良，穩住韓復榘，離間陳濟棠，幾乎以一己之力達到了武力交鋒、人頭落地也未必能達到之目的。

其後蔣伯誠的人生軌跡也證明蔣介石眼光和用人上的獨到：配合中樞，懲辦不抵抗日軍的韓復榘；在大上海，領導桀驁不馴的杜月笙、戴笠、吳開先、吳紹澍，獲取大量日軍情報，收服一些搖

擺不定的漢奸。日軍花了大量精力，終將蔣伯誠抓獲，軟硬兼施，嚴刑拷打，致使其終生殘疾。但蔣伯誠忠貞不屈，絕不吐露任何機密。抗戰勝利後，蔣伯誠竟以半身不遂之身，指揮大漢奸周佛海暫時穩定接收大上海，亦可見其人之高明非常人所能及。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軍政要人都知道，蔣伯誠來了，往往有好戲要唱，因為「蔣伯誠是總統最信任的人」¹。

何應欽與蔣伯誠的關係可謂親密無間。何在進入黃埔軍校之前，一度是蔣的下級，至後來，兩人的職務才倒轉。然何對蔣依然信任有加，事事都請教蔣伯誠。至於何應欽與蔣鼎文，他們關係本來密切，所以當何應欽對蔣鼎文反覆叮囑且煞費苦心安排蔣伯誠接機後，蔣鼎文「不理會」其用意，依然先隨宋氏兄妹去孔公館，何就不高興了。據說以後除公務以外，何應欽幾乎斷絕了與蔣鼎文的私下往來，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解除何應欽的軍政部長職務，何赴美遊歷，一度失權之時，蔣、何二人惺惺相惜，重聚話舊，各述感懷，才冰釋誤會。

再接前面話題。此時位於南京高樓門的孔公館已成了宋美齡的臨時行宮，孔祥熙見蔣鼎文先來他的公館自然非常高興。蔣鼎文在那裡邊用餐，邊向宋美齡、宋子文及孔祥熙介紹了他所知道的西安情況，並告知他們無論是張學良還是委員長都希望和平解決此事。同時，蔣鼎文向宋子文轉達了張學良邀請其急赴西安一談的願望。

蔣介石被扣西安、失去自由已整整一個星期，此前雖有端納的電話、張學良的電文，一再告知蔣介石的平安和西安諸人的動態，然這畢竟是千里之外，畢竟是隔空傳聲，如此面對面的講述，並由他手下親信將領專函帶來，「二宋一孔」更堅定了和平解決此事的決心。

¹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頁。

孔祥熙簡單地向蔣鼎文介紹了中央作出的相關決議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動態。孔清楚蔣鼎文與南京各界的大員關係都不差，由他傳令遞箭，從中溝通，孔對說服諸位重要人物停戰待議的信心頓時增強。

宋子文事先已知道蔣鼎文此行的使命，因為張學良已電告了他。他急於瞭解的是張學良、楊虎城之間的關係，中共插手的程度，張學良是否還能控制西安的局面等情況，因為他想為他將去西安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蔣鼎文一一回答了宋子文的提問，並急切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也希望宋子文能儘快動身去一趟西安。畢竟宋子文與張、蔣的關係擺在那裡，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正當他們還想再作策略上的探討之時，蔣委員長的侍從二室主任，也是蔣介石的心腹陳布雷急急匆匆地趕來了。陳布雷的焦慮並不亞於他們。於是蔣鼎文又向陳布雷簡單重述相關話題，然後二人驅車直奔何應欽公館，此時，何應欽已在那裡等待。

其時的何公館非常忙碌，各種要人川流不息。何應欽既然是南京政府的軍政部長，自然是軍事指令下達中心，更因為他剛剛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顧東西二路的即時軍事部署迅速彙集到他案頭上，亟待他同意批復。而蔣委員長所書停戰手令，又與他緊鑼密鼓的軍事安排有點背向而行，所以他在急迫地等待蔣鼎文的彙報。

作為蔣鼎文，至少在場面上他所持委員長的停戰手令是直接下達給何應欽這位軍政部長的，按理應先到何應欽公館。然蔣鼎文卻先彼後此，這一拜訪的次序先後，事實上已非常明確地宣告了他的立場，他是主和陣營中的重要一員。

何應欽與蔣鼎文除一直是上下級關係外，從私誼上說，亦素來友好。蔣鼎文曾談到，何應欽入

黃埔軍校之前曾經是蔣伯誠的下級，後經黃埔軍校龍門一躍，何應欽的軍事才幹有了施展的機會，蔣、何的位置發生了倒轉，但二人之間包括北伐以後到浙江主事，何應欽與蔣伯誠的配合可謂融洽。而蔣鼎文結識何應欽，亦是在入黃埔之前通過蔣伯誠介紹而成為知交。何應欽深知，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多在公幹層面，若論在蔣介石面前的隨便程度，談話的深淺，蔣鼎文則要遠超於他，因而在西安事變發生不久，他即力促張學良派蔣鼎文來京面洽。此次蔣鼎文荷任抵京，是向他來傳達蔣介石命令的，蔣鼎文先去孔公館和宋美齡處，這樣做似乎是「先私後公」，何應欽覺得不太舒服。

蔣鼎文到了何公館後，兩人沒有過多的寒暄。蔣取出蔣介石的停戰手令，鄭重地遞給何應欽。對於信的內容，蔣鼎文在西安、洛陽時已電告過他。何現在所關心的是蔣寫這封信是否屬於其內心的真實想法，以及張、楊到底會對蔣介石怎麼樣。要回答這些疑問，蔣鼎文無疑是最直接的。蔣鼎文在回答了何的問話之後，又直截了當地問何應欽下一步到底做如何準備。與此同時，蔣鼎文也瞭解到何應欽的一些難言之隱，他也夾在其中。

是晚八點，南京舉行陣容齊整的軍政會議，會議的主旨當然是聽取蔣鼎文對西安的情況彙報，以及由此作出下一步的政治軍事行動。會議參加者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各院院長、軍事當局主要掌事者。會議一直開到十二點多才結束。

蔣鼎文除報告西安的情況外，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委座已下達停戰手令，張學良也有強烈的示和舉動。我們對此不能漠視，而應據此調整原有的計畫和安排。因為事情發生了變化。」

在座的人員都知道，蔣鼎文是一位披堅執銳的猛將，戰之則勇是他的特色。對於打仗，職業軍

人有一種天性的敏銳，他們的價值和利益在戰爭中能得到最大的體現。怎麼在如此濃烈的大戰氣氛中，他反而怯步了呢？

蔣鼎文繼續說道：「現在的情況很清楚，如果我們繼續轟炸，揮軍西進，則南京與西安之間距離不但不能拉近，而且裂痕會越拉越大，直至崩塌。如此，不但委員長可能殉難，大戰亦不可避免。作為委員長個人來說，他的死會在歷史上留下名聲，但作為國家和民族來說，前景不堪設想，四分五裂的混戰局面必將出現。如此我們將如何面對我們的百姓、我們的民族？」

在座的一千大員肅靜無聲。

蔣鼎文接著說：「當我乘機離開西安時，張學良非常真誠地告訴我，銘三兄，你一定要帶信給南京諸位朋友，西安掛的仍然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絕對沒有一面共產黨的紅旗，張學良仍然是聽命於南京的中央政府。對於張學良的和談誠意，我們不要拒他之於千里之外。」

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為蔣鼎文的呼籲領首。

宋美齡在事後的《西安事變回憶》中清晰地回顧了蔣鼎文這番擲地有聲的話語：

「二日後，蔣鼎文果來，彼等聞其面述委員長令，始服從無間言。蔣鼎文並懇切勸告，勿任南京、西安間之裂痕日見加深，謾罵之無線電廣播及惡意之報紙論文，皆以終止為佳。同時其他方面阻止衝突之努力，亦在進行中。」¹

蔣鼎文的報告和大聲呼籲無疑是這次會議的亮點。中央會議最後做出決定，在軍事上暫停轟炸和進軍；在西安問題的處理上，「密謀出解決之法」。自此日後，不少主戰派亦轉變態度，認為「和

¹ 宋美齡：《回憶西安事變》，李立編：《親歷西安事變》，第三四三頁。

談」也是一個辦法。

上弦之箭在蔣介石的手令到達和蔣鼎文入情入理的籲請後，終於暫時放了下來。南京方面已經不排斥以「和平調解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甚至在如何營救蔣介石方面取得了部分共識。

一線陽光穿透厚厚烏雲，天空中和平之光漸漸顯亮起來。

十九日，南京當局又召開會議，為暫時停戰做出實質性的決定。何應欽隨之電告「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及各將領。電文云：

急。南京孔代院長鈞鑒：頃致前方劉總司令及各將領一電文曰：皓日下午一時半，孔院長祥熙、居院長正、孫院長科、葉秘書長楚傖、宋委員子文、王委員寵惠、蔣夫人宋美齡、何部長應欽等，在孔院長私邸，會談營救委座之最後辦法，決定如左：一、准宋委員子文用私人資格名義赴西安營救委座。二、准許至十二月養日（二十二日）止，暫行停止轟炸。但張、楊所屬各部，在此期間不得向南移動。各該逆部如仍向西安、渭南前進，我空軍即向行動部隊轟炸。以上二項，為最後之容忍。但我軍之集中偵察與攻擊準備，仍須積極進行，不得延誤，希即轉飭遵照等語，特此奉聞。何應欽叩。皓未、鎮二。印。¹

十九日這一天，宋子文帶著楊虎城的好友郭增愷於下午二時半左右，乘飛機先飛赴洛陽，再於次日上午到達西安，開始他私人的和談之旅。

¹ 《何應欽代電》，轉引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四九頁。

蔣鼎文、宋氏兄妹、孔大連襟組成的「和談核心」在與戴季陶、居正、朱培德、何應欽、吳稚暉、陳立夫、馬超俊等「討伐派」的對話中，暫時占得了上風。儘管對展開和談的條件有些嚴苛，但畢竟贏得了寶貴的幾天時間，事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其時，張學良在西安時時關注著蔣鼎文的動靜。他深知，是和是戰，蔣鼎文此行至關重要。

張學良在擔心南京方面對西安的相信程度有幾何，其後幾天裡他還憂心忡忡：「蔣（介石）關在我們這裡，他說的話，何應欽不見得聽。我們逼蔣下令，如結果無效，怎麼辦？」¹

張學良對於蔣鼎文的掛念，從蔣介石所寫的《西安事變半月記》中也折射出來。蔣介石是這樣記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午後，張（學良）又來見曰：「此事甚多轉折。現在不知如何，先派銘三飛洛通信，餘事再議。頃已送銘三上飛機赴洛矣。」

十二月十八日：張又言：「銘三到京，尚無來電。」狀似焦急。

十二月十九日：是晚，張又來言：「子文、墨三尚未有來陝確期，唯銘三已來電，稱彼到京報告後情形頗佳。」

與蔣介石記述所印證的還有陳誠的《西安事變紀事》：「十二月十八日……張（學良）謂銘三從陝飛洛後，曾來電話，但抵京後，迄無消息，或係被京方包圍，亦未可知。」

到了十九日，張學良等不及了，他乾脆直接給蔣鼎文拍發電報。然蔣鼎文飛洛轉寧之時，正是南京方面天上、地下開戰氣氛洶湧澎湃之際。張學良認為，自己與蔣鼎文披肝瀝膽，真誠相告，兩

¹ 《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八九頁。

人為何說服南京方面接受停戰談判作了充分交流，特別是上機前夕，雙方互相作了叮囑。可蔣鼎文一去幾天，除電告「情形頗佳」外，別無其他實質性的利好傳來。張學良有點急了，也有點擔心，蔣鼎文是否已被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壓得說不出話來，他是否被洶洶的主戰浪潮所湮沒。為此，他給蔣鼎文發出一封長長的電文：

蔣主任銘三兄勳鑒：

巧亥電敬悉。鬥密。此間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此種情形，兄已澈底明瞭，請兄返京，確是誠心誠意，力謀解決此事。若大家能仰體委座之意，為國家著想，使抗日實現，則國際地位立時提高，委座得享千秋萬世之令名，豈不善哉！文日之舉，純為愛國家，愛介公，絕無金錢欲望，但求國家不亡，絕不顧任何犧牲。此情兄已盡知，想到京以後，應不至因眾口訕訕遂不盡言。總之，抗日主張如不能實現，難送委座回京。南京同人如能平一時之忿氣，為整個事體打算，則一切一切，（不）難辦（到）。否則，不顧大局，必欲用武力以對內，須知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之度外。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誰造內亂，誰誤國家，自有天下後世之公論也。弟部並未前進，而中央軍已闖入潼關。是中央早已敵視此間，不惜國家與民命。中央既已不惜，弟等雖惜，亦復何用！國家安危，繫於一念。請兄轉達南京黨政諸公，共審慮之！如尚欲求解決，仍請子文、墨三兩兄即來此間，極為歡迎。否則只好各行其是，咎不在我矣！弟張學良。皓至。¹

1 《張學良至蔣鼎文電》，轉引自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第五四七—五四八頁。

張學良發給蔣鼎文這份電報，是西安事變中一份非常重要的電文，資訊容量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此間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說明在十七日之前，蔣介石已同意張、楊的抗日主張。

其二，對於這種情況和請蔣鼎文出使南京，張學良說，此事「兄已澈底明瞭，請兄返京，確是誠心誠意，力謀解決此事」。

其三，西安之舉，張學良純為國家，無金錢之求，且不顧任何犧牲。對此張在西安時已與蔣鼎文充分交心：「此情況兄已盡知，想到京以後，應不至於因眾口叕叕遂不盡言。」你千萬不要被南京的喧鬧、好戰之聲所左右，也不要因此而不得暢盡所言。

其四，張學良又強調，「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之度外。為自衛計，為國家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做這樣的驚天舉動是經過充分考慮的，中央若要動用武力，我們將自衛反擊，言語之間毫無畏懼之色。

其五，至十九日雙方部隊的現狀是：「弟部並未前進，而中央軍已闖入潼關。是中央早已敵視此間，不惜國家與民命。中央既已不惜，弟等雖惜，亦復何用！」講和談判是要雙方誠心誠意的，氣氛是要雙方創造的，而不是一方的，更不是大軍壓境所能解決的。

張學良陳述完現狀和信念後，對蔣鼎文又提出了要求，「請兄轉達南京政黨諸公，共審慮之」，並提出按照原議，「仍請子文、墨三兩兄來此間」。倘中央不謀求同步，而執意自行其是，以後發生的不測事情，就怪不得我張學良。把蔣扣押在手，張還是有談判的籌碼的，否則怎麼叫「兵諫」

呢？

給蔣鼎文發去電報的同日，張學良又給孔祥熙發出一電，除重述了給蔣電文相同內容以外，又指出，現在「銘三兄到京，想已悉此間真況」，西安的情況，你們多問問他就行了。

言下之意很清楚，既然情況已明，你們就不能再作出不瞭解西安真相的決議。給孔祥熙的電文是這樣的：

孔院長庸之兄勳鑒：

咸、洽兩電均敬悉，密。前電拍發稍遲，致勞切念，復承拳拳故舊，再三見教，至感。銘三兄到京，想已悉此間真況。中央同人果愛國家、愛介公，自當推人來陝商洽。抗日實現以外，別無所求，更無金錢與地盤思想。區區志願，蘊之已久，決非一時衝動。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弟之部隊，初未前進，而中央軍進入潼關，占據華陰一帶，反誣此間準備攻豫，抑何顛倒事實之甚耶？如中央必欲造成內戰，弟等亦唯有起而自衛，誰負其責，自有公論也。特覆。弟張學良。效戌。¹

此時的蔣鼎文除在會議上大力主張和談以外，還在各種場合向他的朋輩同黨、黃埔將領介紹西安的真實情況，告訴他們的委員長平安如常及張學良扣蔣的真實想法，盡一切力量和努力阻止戰火蔓延。

1 《張學良至孔祥熙電》，轉引自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第五四五—五四六頁。

各路要人也紛紛到蔣鼎文下榻處打聽情況，商討對策。《大公報》在十二月二十日發出新聞：「蔣鼎文抵京後，各方為明瞭西安事變經過，前往黨公巷蔣之駐京辦事處探詢者甚眾，如孫科、王寵惠、張發奎、覃振、劉振寰及陸大學員代表等均於十九日訪蔣慰問，宋子文亦訪蔣詳談。」

在京大員將蔣鼎文報告的內容也悄悄地傳給與他們關係密切的諸侯，如薛岳給雲南的龍雲拍了如下秘密電文：

昆明。主任龍：作密。（子）京電。

一、張容共聯俄抗日主張，須有事實表現，方送出委座。張覆閭電，戴文不能單見委座，聞趙有不去陝說。二、據蔣鼎文說：在陝諸公，除邵元沖外，確實均平安，惟監視甚嚴，不能隨便面談，已由招待所遷寓仁壽里房屋內。此次回京，蔣公百里建議，經張同意，同張謁委座，當即面書函，文如報載，並未多談等語。三、宋子文哥由洛飛陝，設法營救委座等語。謹聞。職薛岳。個已。築秘。印。¹

蔣鼎文此行南京，對中樞決策乃至各方諸侯「和戰」天平的傾斜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七、再返西安，談判調停

宋子文在二十一日下午自西安回到南京後，對張、蔣乃至中共的想法的瞭解又比蔣鼎文深入一

¹ 《薛岳至龍雲電》，雲南省民國政府檔案。

步。這是因為宋子文是張學良邀約去的，雖然南京政府和宋子文本人認為此行係「私人身分」，不代表國家立場說話，然到了西安以後，張學良、周恩來包括蔣介石不會把宋子文看做是「私人身分」的，他們都會面談話了。從西安實地歸來，宋子文認為，此事應以和平妥然的政治方式解決，這也是「拯救中國唯一之途徑」。

宋子文馬不停蹄地與各位軍政大員商談，首先他要求蔣夫人宋美齡盡快去西安，以儘快改變蔣介石現在所流露出來的「聽天由命」的態度；其次，他告訴蔣鼎文、孔祥熙、顧祝同、葉楚傖、熊式輝等，張、楊所提出的四項條件（即改組政府、採納抗日分子；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發動抗日運動；釋放被捕七人），應理性地與他們討論；其三，西安的事情無論如何不能軍事解決。在與何應欽洽談時，宋子文還告訴他，他再返西安時，自己設想還請戴笠偕行，戴笠去西安的身分可以黃埔系將領的名義出現；同時再請一位高級將領一道去西安。

何應欽立即表示異議：「為什麼要請戴笠去，蔣銘三難道不能代表？」

因為蔣鼎文在這之前告訴何應欽，他那天已向委員長說過，無論情況如何，他還會再回西安的。

宋子文連忙說：「高級將領的代表，我意也請蔣銘三去。但他剛出西安危城，讓他再回去，有點不大好開口。」

何應欽又說：「戴笠能不去嗎？」

何除對戴無好感外，還考慮到這種時候再讓一個感觀不大好的特種人物出現在這種特定場合，是否會橫生枝節。

宋子文補充道：「我已先斬後奏了，把夫人、戴笠以及一位高級軍官代表和我本人組成的團隊

將赴西安告訴了張學良，張已覆電同意。」

何應欽不好再說什麼，他知道這樣的安排宋氏兄妹和孔祥熙都是商量過的。隨之何應欽同宋子文說：「讓蔣銘三再返西安，我自會同他說，你也請蔣夫人再關照下銘三兄。」

這樣的安排，事實上組成了一個談判代表團。這不僅說明南京政府對蔣鼎文的高度信任，同時也說明其時的執掌者不希望橫起戰端，他們已從過去的訴諸武力轉變成不排斥和平方式解決了。這幾天來，蔣鼎文不斷在與何應欽作交流分析，何也樂意探索蔣介石的真實想法。蔣鼎文非常清楚，何應欽的意見舉足輕重，大老們的「眾口叻叻」，斷斷不如何應欽的實權在握。

宋美齡又找了蔣鼎文，這在她的《回憶西安事變》中也有反映：蔣鼎文雖已出陝來京，但「余念委員長或需軍官如彼者為代表，請彼（蔣鼎文）與戴笠偕行」。在文中，宋美齡把蔣鼎文從南京再返西安危城，似又提高到新一層境界。她繼續寫道：蔣鼎文去而復來，是「對西安表示中央之信義，決不一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

宋子文的日記，宋美齡的回憶，何應欽的團隊人員安排，都反映出蔣鼎文這次是作為南京一方的代表去西安，他是解決西安事變不可或缺的人物，如遇緩急難濟之時，他可以在蔣介石、張學良兩邊起些協調緩衝。

事實上，讓蔣鼎文折返西安，不但宋美齡開口，宋子文自己也與蔣鼎文講了，請他再冒次危險。微妙的是，宋子文還向蔣鼎文請教軍事問題，請他從軍人的角度看南京政府的軍事安排，因為宋對何應欽有所顧忌，不願再向何多問什麼。蔣鼎文明確地告訴宋氏兄妹，據他觀察和所知，中央軍的軍事部署時間：「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前無論如何不會開戰，因為軍隊之調遣與實際投入戰鬥至少須

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始得完成。」¹

根據軍事部署時間倒排，宋氏兄妹與蔣鼎文商定，他們的目標務需在聖誕節之前和平營救出委員長。

蔣鼎文對於與宋子文這位前財政大臣通力合作稍感欣慰。略顯尷尬的是蔣鼎文在兩年多之前，據說為執行蔣介石解除宋的財政部長一職而充當過馬前卒的角色。事情是這樣的：

當蔣介石在江西對紅軍第三次圍剿失敗後，便趁暑期在廬山召開會議。為了再次圍剿紅軍，他決定增加作戰經費。是時恰逢財政部長宋子文從美國歸來，交涉以美國棉花、小麥實物作價五億美元的借款成功，宋子文志得意滿，特到廬山向蔣介石報告。蔣聽取經過後，當即提出江西仍將對共軍用兵，需增加軍費若干。宋即以預算有限而不同意，兩人不歡而散。翌日上午，蔣再約宋談增加軍費問題，宋仍一如昨日，以不能超出預算而予拒絕。蔣即怒而離座，進入內室，宋子文無趣地自返南京。

宋子文屢屢觸拂蔣介石旨意，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痛罵過他，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記：「與宋子文談財政，曰『子文氣焰萬丈，不可一世，可痛也』。」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記：「宋子文對國防經費與軍費舊欠，皆置不理，其禍國殃民，害公誤私之罪，余在牯嶺時曾面斥之，彼意不司，而藉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之地位，與我為難。」

蔣介石決心撤換宋子文。有一天下午，蔣令當時亦在廬山的俞飛鵬、蔣鼎文二人來見。當面告之：「我已決定樵峰（即俞飛鵬）去接任財政部長，銘三去幫樵峰辦理接收。你們二人可即去南京，

¹ 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第三五八頁。

等候命令。」

俞飛鵬、蔣鼎文二人到達南京後，住進中央飯店。不一會兒，宋美齡就來電話找蔣鼎文：

「銘三，你和樵峰奉令來南京，是否要樵峰接子文的財政部長？」

蔣鼎文知道蔣夫人不好惹，兄妹二人關係又特好，故而不置可否。原來在宋子文返回南京時，宋美齡就給蔣介石打了電話，說：「子文返抵南京後，自知錯誤，擬再來面謁，如何？」蔣當時決心已下，當即覆電：「不必。」

蔣介石的日記對這事有如下記述：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思解決宋子文把持財政事」。十月二十九日，「開會決議，准宋子文辭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各職，以孔祥熙繼任」。

幾天後報載：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照准，然並非俞飛鵬而以孔祥熙接充。

據蔣鼎文觀察，宋子文在財政部長任上想搞個人權力的一些事情為蔣介石所不容，故蔣執意撤換並非偶然。宋子文以為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政治地位，因而竭力進行軍事運作，除力交張學良外，還對雜牌部隊討好示意，而對蔣介石要錢卻予以拒絕。此外，宋還在財政部稅警名義的掩護下，自行建立軍隊，幾年中已成立三個團，編成一個總團，其裝備和武器精良，似乎成了宋子文的私人武裝。不過隨著他財政部長職位的解除，這些武裝也就「煙消雲散」。

不管怎樣，宋氏家族和蔣鼎文都是難以離開蔣介石的，他們在根本利益上保持著一致。辭職復職的小小芥蒂算得了什麼，眼下的大事是如何和衷共濟，想方設法救出蔣介石是當務之急。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戴笠、郭增愷及其他隨行人員，乘著「容克」號飛機向洛陽飛去，擬在洛陽稍作停留後再飛向西安。

這一天久雨初晴，天氣晴朗，宋美齡的心情也舒暢起來，話也比往日多了。宋子文的英文秘書陳康齊的日記是這樣記述的：「夫人看起來很高興，好像此行是一個快樂的旅程。」然，要說「內心快樂」，未必；要說宋美齡這樣的強人不想把自己的擔心過多地感染給她的同行者，盡然。她也知，儘管此行眾人是她的兄弟和深受蔣委員長器重的將領，但他們畢竟是冒著難以測度的危險去拯救她那落難的丈夫。

約二時，飛機來到洛陽上空，宋美齡看到機場上一排排的轟炸機整裝待發，心中不免掠過幾絲陰影。飛機剛停穩，東路軍前敵總司令徐庭瑤及空軍司令等將領迎上前來，蔣鼎文隨宋氏兄妹走下飛機。宋美齡其時的官方身分是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對於航空事業，宋美齡的確花了心血，憑著她的特殊地位，從經費上、人才調配上為航空部門排憂解難，空軍的將領們對蔣夫人自然又多了一分親近。故而宋美齡可以用嚴峻的口吻告訴他們：「未得委員長的命令，切勿派飛機靠近西安。」這實際上是要求空軍不得再行轟炸，誰都知道，身陷圍圈的委員長其時怎可能向他們直接下達軍事命令呢。

當飛機在西安上空盤旋預備降落機場時，宋美齡還是有幾分緊張，她把護身的小手槍遞給端納這位慈祥的長者，正色地對他說：「若張、楊軍隊滋擾無法控制，他們要對我侮辱有失尊嚴之時，請你馬上用這把槍打死我。」端納一怔，蔣鼎文馬上過來安慰：「夫人請放心，他們不敢出此異端。」飛機已經低空飛行幾圈，仍不見機場上的接機車輛，為免意外發生，他們決定再飛往城區上空不斷地盤旋，以期引起城中注意。少頃，張學良駕接機車隊而來。

待飛機著陸停穩後，張學良趨前相迎。宋美齡告訴張學良，希望他通知部下，不要檢查其隨帶

行裝。張學良馬上回答：「夫人何出此言，學良安敢如此。」

見到蔣鼎文下來，張學良跨前一步，迅速拉住他的右手，同時用左手拍著他的肩膀說：「銘三兄，果然是條好漢，不怕死，又回來了。」

蔣鼎文巧妙地回答道：「哪裡！副司令是大好漢，我蔣鼎文是條小好漢。」¹

二人隨之大笑，雙方互詢別後之情，此時端納也插話進來，張、宋初見時拘謹的氣氛一下子被驅散。

戴笠就沒有這樣的待遇了。戴笠此行，還是一如過去，隨身帶著他心愛的兩支勃朗寧手槍。張的衛士馬上請他交出手槍，戴笠心有不願，衛士堅持，戴笠只有繳械。

一行數人先到張學良公館。宋美齡略作品茗後，就在張學良的引導下，來到蔣介石的住處。張學良未便入室，折返自己的住處。

未幾，張學良就與宋子文、蔣鼎文及戴笠在自己的會客廳裡就此行的議題作討論安排，雙方達成統一意見。蔣鼎文還向張學良遞交了由何應欽手書的停戰條件。張學良看後認為，這些條件在東北軍方面做到並不難，唯現時中央軍還在前進，偶然間的擦槍走火是他們所無法控制的。

蔣鼎文見還有些時間，就向張學良提出，能否現在去看望一下陳誠他們。張學良略遲疑後就答應了，他馬上電話通知王以哲、孫蔚如過來，讓他們陪同蔣鼎文去看望。對此，陳誠的《西安事變紀事》是如此記述的：

¹ 朱幼蛙：《蔣鼎文其人其事》，見浙江省政協文史委：《浙江文史集粹》下冊第五七六頁。朱為蔣鼎文部屬，朱說這兩句話是蔣鼎文親口告訴他們的。

十二月二十二午後，銘三偕王以哲、孫蔚如同來。據銘三告余等（陳誠與朱紹良同住），彼係與蔣夫人及子文一同飛陝，現在大體已有辦法，當不致再有大問題云云。王以哲、孫蔚如雖係同來，均未發言，其同來之用意，蓋即張、楊派以監視銘三者，故銘三亦未能多談，稍坐即去。

從中也不難看出，甫到西安，蔣鼎文、宋子文與張學良所談還是十分融洽的。否則，蔣鼎文不會如此肯定地告訴陳誠：此事「現在大體已有辦法，當不致再有大問題」云云。

回到張公館後，天色已沉，蔣鼎文和戴笠在時任西北剿總司令部政訓處長曾擴情的陪同下用了晚餐。曾擴情一度亦被張、楊扣押，此時已獲有限自由。三人交談不多，餐畢，戴笠去張公館地下臥室休息，而曾擴情則回自己省銀行原住宿之地。

未幾，蔣百里來訪，雙方略事寒暄，未及正題。不過，蔣百里告訴蔣鼎文：「兄之歷史性檔（指蔣鼎文致何應欽電文）我已妥為保存矣。」蔣鼎文笑而謝之，旋即蔣百里辭去。

蔣鼎文正與宋子文一起商討次日的安排，突然一聲「銘三兄」的叫聲把他們的討論打斷。室內的燈光有些朦朧昏暗，蔣鼎文見來人穿件略顯臃腫的灰色棉布軍衣，臉上的鬚鬚也有些長。蔣鼎文呆在那裡，一下想不起這個人來，而宋子文則端坐一旁竊笑。這時那人接著說道：「銘三兄，一別十餘年，怎麼不認識我啦。」蔣鼎文略顯尷尬，摸著頭注視面前這個人，怎麼也叫不出對方的名字來。那人見他實在想不起來，便不再為難他了，笑著說：「銘三兄，你好忘性，我是周恩來」

啊！」¹

蔣鼎文馬上離開座位，握住周恩來的手連聲叫道：「恩來兄，可是你啊！」隨之又補充道：「想當年你是翩翩年少，一身西裝革履，風度不凡，遠近聞名的美男子。可今日怎會變成連我都認不出來吶！」

「銘三兄，這都是拜校長所賜，你們一路窮追猛打，毫不留情啊！」周恩來的回話還是有些玄機，隨之話語轉緩，「不過歲月催人，大家都有些變化了。」

「不不，你只不過多些鬍鬚罷了，你當年在黃埔講授的法國大革命史，我至今記憶猶新，你可是一個喝過洋墨水的新派人物啊！」

由於互相熟識，互相慕名，且是紹興府小同鄉，兩人談話隨意又投機。未幾，蔣鼎文又向周恩來問起另外一樁事：

「恩來兄，我向你打聽一位被貴軍俘獲的好友，他也是我同鄉。」

周恩來是何等機靈的人物，便馬上接口道：

「你問的是陳時驥將軍嗎？」

「對，對，我打聽的正是他。」蔣鼎文急於要知道陳時驥的下落，因為陳的家屬已多次央托過他，可他就是無法回答確信。

陳時驥，幼名陳小毛，初入浙江陸軍學堂，比蔣鼎文高幾級，又輾轉武昌陸軍預備學校，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在浙軍周鳳岐部，先後任營長、團長職。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時任

¹ 分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二頁；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二六頁等。

趙觀濤第六師第八旅旅長，投入隴海線作戰，其部統歸蔣鼎文指揮。陳因與該師師長趙觀濤意見不合，連同該師第十七旅旅長樊崧甫一起辭職。時經陳誠斡旋邀請，陳時驥出任第四次圍剿紅軍中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未幾調任新組建的羅卓英第五軍第五十九師中將師長，由陳誠統一指揮剿共。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五軍李明的五十二師、陳時驥的五十九師，在黃陂的險峻山路上行軍，被設伏的中央紅軍一舉全殲，五十二師師長李明受傷致死，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被俘。

周恩來坦率地告訴蔣鼎文，陳時驥被俘不久後就去世，又說他是病死的。

雙方一陣沉默。

真是事有湊巧，西安事變平息未久，陳時驥的保定同學，也是中原大戰時與陳同在第六師任旅長的樊崧甫，又向周恩來打聽起陳時驥的下落來。

樊崧甫，字哲山，浙江縉雲人，曾任國民黨軍第四十六軍軍長，時任「討逆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前敵總指揮兼第一總隊總指揮，於一九三七年一月進駐西安。其時周恩來還在西安，樊崧甫知道周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人物之一。樊是這樣記述的：

我到西安時，住在西京飯店，一日茶房送來一張名片，我看了大吃一驚，原來是周恩來代表，我在江西戰爭時看過多次《紅星報》，讀過周所著的社論，我覺得他文字好，道理通，對他很敬仰……見面時我看見他長袍馬褂，鬍子欣欣，像一個紳士派頭，我表示過去讀過他的文章久已傾慕的心情，我問到從前被紅軍俘虜去的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六師十八旅旅長葛鐘山兩個同學，傳聞被紅軍殺死，是否真的？周說：「是病死的，不是殺掉的。我們對俘虜是優待

的。」¹

周恩來與蔣鼎文、宋子文交談未幾，就告辭了。

宋、蔣二人繼續圍在一起商議如何讓中央軍後撤的問題，因為剛才張學良與他們面談時，特別提及西安方面的軍隊並未向東越進，而中央軍則步步進逼，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的部隊極有可能擦槍走火，一旦槍戰發生，保不了發生大戰。如此，局面就無法控制，他們所有的奔走努力也付諸東流，前景不堪設想。

其時的宋子文，除係中央執監委員外，在軍政部門不擔任實職。第一次來西安之時，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對阻止他西行的南京高官們說，他去西安，純係私人身分。這樣的回答，雖使討伐派無言以對，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在場面上，他也無法對南京方說三道四，或是發文傳令。再加他對軍事問題無發言權，故而只有請蔣鼎文拿主意。

作為軍人的蔣鼎文很乾脆，他認為戰場上兩軍對峙時，為防偶然因素引起交戰，不必講任何退防理由，雙方長官下達命令各往後撤是唯一的辦法。他說，現在的情況，別無他法，為免交火發生，只有電請中央軍後撤，並徵求宋子文的意見，宋子文表示贊同。蔣鼎文當場擬就給孔祥熙、何應欽的電文，並隨之發出，電云：

南京孔部長譯轉何部長：

¹ 樊松甫：《親歷西安事變》一文，見李立編：《親歷西安事變》，第一九五頁。

梯密。夫人暨宋部長等已於五時安抵此間，即將部長手書停戰條件交張、楊兩位，轉告前線知照。唯此間同人尚望雙方警戒線均稍向後移，免無知士兵誤會衝突，中央方面最好能將主力撤至華陰附近，華縣仍歸中央軍前線。乞尊裁轉令遵辦。鼎文。養。印。¹

繁忙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是日深夜，蔣鼎文輾轉難眠：南京的孔、何是不是會按照自己所發電文那樣去做？這個讓部隊後撤的電文，事實上有點「命令」的口吻，自己雖是蔣委員長所派的使者，又是事實上南京方委派的在軍事上拿或和戰主意的人物，但這樣的電文總似乎有點「以下令上」的感覺；更重要的是西安方面的情況，尤其是張學良方面的想法，南京大員們實際上還不是很瞭解，對張學良他們還是有排斥相拒的心理，還是有大軍壓迫，屈人之兵的凌駕之勢。蔣鼎文想，不管怎樣，絕不能開戰。早晨起來，蔣鼎文又給孔、何發了電報，除重申昨電內容外，要求何應欽將真正的軍事意圖密告他。

南京方面還未覆電，西安方面又生波瀾。

張學良、楊虎城提出了新的「釋蔣」方案，張、楊交給宋子文和蔣鼎文的建議方案是：由蔣介石委員長出面，立刻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員名流出席的一個大會，會議地點放在西安。出席人員應包括陳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馮玉祥、孫夫人、韓復榘、宋哲元、劉湘、宋子文、張學良等。大會要作出一個決議後，蔣委員長方可離開西安。會議地點也可放在太原舉行。但不管在哪裡開會，在會議作出「決議」之前，委員長仍要留在西安。

¹ 《蔣鼎文致孔祥熙、何應欽電》，轉引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五八—五五九頁。

會議的議題是張、楊在十二月十七日曾與蔣委員長討論過的四項條件：即一、改組政府；二、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三、發動抗日運動；四、釋放被捕七人。

顯然，張、楊提出的出席會議人員幾乎沒有南京方面的核心人物，對南京政府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出席的人員要嘛是剛被蔣氏平定下去的地方實力派，要嘛是與蔣介石還在討價還價、打太極的人物，這樣以各地方實力派來圍攻「委員長」，確有「挾諸侯以令天子」之意。顯然張、楊是想從一隅推廣至全國，然後以合法的程式達到兵諫之目的，出發點和用意不可謂不好，然方式上似乎要把蔣介石和南京當局逼上無法退卻的地步，亦係一廂情願。

宋、蔣包括戴笠看到這個方案後，一致認為這份方案既為南京當局所不能接受，也是蔣委員長所不能同意的。如按此方案談判，不但曠日持久，且會橫生變數。面對嚴峻的現實，他們討論後決定，以十七日張、楊遞交給蔣委員長的方案為基礎，針對張、楊提的新方案，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處理，再提出一分談判反建議方案，內容是：

- 一、不召開名流與政府官員參加之大會；
- 二、改組政府，排除親日派；
- 三、釋放在上海被捕之人；
- 四、強力保護國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組成，中日戰爭將很快爆發。戰爭一爆發，塘沽何梅察北協定將自動廢除。

他們所提的這分反建議方案，由宋子文遞交給蔣介石過目批准，蔣看後表示同意。對於這分反建議方案，張、楊、周組成的「三位一體」代表也沒有表示反對。若將雙方的兩份方案對照一下，

除了要求「蔣委員長出面召開朝野各界名流大會」有所分歧外，其他各條雙方都同意，實際上是回到十二月十七日蔣介石曾與張、楊討論過的內容上來。由此看來，「三位一體」的談判策略是先進兩步，再退一步，獲得了事實上的成功。張、楊也知道要現時的蔣介石出面召開全國會議是做不到的。

有了共同基點以後，宋子文等與張、楊、周先就實質性的政府改組問題展開討論。西安方面的意見是讓宋子文組閣，宋表示拒絕，理由是「政治及個人的原因」。宋心中非常清楚，即或他願意，蔣介石與南京國民黨方面也絕不會認同，南京方面有大員甚至懷疑是宋子文策動這次西安事變，並且一度風傳政界上層。

宋子文會同宋美齡向蔣介石彙報了談判情況，蔣介石除贊同相關事項外，又提出了一些實質性的議題，特別是中央軍撤退、陝軍調離、張學良的安排、紅軍的改編等即可操作的事項。為落實中央軍的後撤問題，蔣介石準備再派蔣鼎文飛赴洛陽傳達停戰命令。宋子文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對蔣介石的答覆是這樣記錄的：

我與蔣夫人一起見委員長，他答覆如下幾點：

- 一、他將不再擔任行政院院長，擬命孔博士擔任。新內閣絕不會再有親日派。
- 二、返回南京後，他將釋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 三、（一）設立西北行營主任，由張負責。
- （二）同意將中央軍調離陝、甘。

(三)中共軍隊應當易幟，改編為正規軍某師之番號。

(四)中日一旦爆發戰爭，所有軍隊一視同仁。

四、(一)派蔣鼎文將軍去命令中央軍停止進軍。

(二)將與漢卿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在離開西安後，他將發布手令。

西安的談判雙方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南京方面似乎並不知道談判的內容和議題，即或連孔祥熙也有所不知。十二月二十三日，孔給蔣鼎文發了一封與當日談判氣氛頗不相融的電報，一味地讓蔣鼎文敦促張學良放人，電文云：

蔣主任銘三兄勳鑒：

梯密。晨電奉悉。關於軍事方面，已由敬之兄電覆，想達。日前漢兄曾言，子文弟如能赴陝，當即能偕同介公回京，想現已致實現時機。介公回京之後，不僅兄保衛介公之苦心可大白於天下，而彼等主張自亦不難商討，容納實施。否則，介公留陝，國人皆認其已失自由，即有容納彼等主張之切實表示，亦認為出自脅迫，中央多數主張，絕不容接受，即希轉告為盼！弟孔祥熙叩。漾亥。¹

1 《孔祥熙致蔣鼎文電》，轉引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第五六〇頁。

這個電報顯示孔祥熙是代表中央同人表態的，口氣非常之強硬，主旨是「先放人、再談判」；而其時西安「三位一體」的要求是「先談判、再放人」，並且要談出個結果簽字畫押再放人。孔祥熙的電文還進一步闡述，與在扣的蔣介石談判，即便蔣容納、同意了他們的主張，中央方面也認為是「脅迫」所致，政府方面也不會接受蔣所答應的條件，也就是說即或蔣介石答應對方條件，中央也可以不算數。在這裡，他們似乎對蔣介石都失去了信任。

蔣鼎文接到這份電報後，交給了宋子文，兩人相視苦笑。他們認為，南京方面難道還不清楚張學良一直告知的「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的強硬表態嗎？如按孔祥熙所提內容催逼張學良，那麼談判立時崩塌，無法繼續。二人商量後決定不向張、楊催逼，繼續以他們原定的內容談判。

對於宋子文轉述蔣介石的答覆，張、楊、周還是認同的，但付之「西安軍事委員會」研判時，卻引起「軒然大波」。多數人堅持他們所提的條款，若非全部，至少是部分，在蔣介石離開西安前要得到履行實施。這樣的要求，實質是要繼續扣留蔣介石在西安。

當張學良把這個資訊回饋給宋子文後，引起宋子文的強烈反彈。宋與蔣鼎文商量決定，一方面與張學良繼續溝通，讓張在內部做些說服工作；一方面按照蔣委員長的原議繼續履行某些條款，先不把張學良回饋的情況報告給蔣，以免刺激他。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蔣鼎文來到了蔣介石、宋美齡的住處，在彙報完相關情況後，蔣介石手書了停戰命令，並交付給蔣鼎文，讓他即飛洛陽向前線將領下達，以此來表示他蔣某人對張、楊談判的誠意。宋子文的日記作如下記述：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蔣鼎文拜見委員長，在拿到其停戰手令後，乘飛機驟然離去，我們均盼望委員長明日耶誕節能動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對這些內容，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來也給中共中央發了電報：

（甲）與宋子文、宋美齡的談判結果。

（子）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丑）撤兵後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蔣鼎文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飛至洛陽傳令。蔣鼎文與何應欽電話溝通後，於次日上午持蔣介石手令至中央軍前線。中央軍從前線往後撤退，為釋放蔣介石創造出和平氣氛，這是張、楊、周及相關各方所樂意看到的。

八、戴笠西安矯情「遺囑」

西安事變的演變在不知不覺中扯上了戴笠，且還是處在向和平轉折的關鍵節點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戴笠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然危難之中的西安一行，畢竟烙上了歷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對於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許多為文作史者有意無意地不加辨識，竟紛紛

落入戴笠精心設計的一個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這一化險為夷的「妙著」，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無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護之舉。

戴笠，一八九七年五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為黃埔系的中生代人物。戴笠為人機警，嗅覺敏銳，心思縝密，機詐莫測，是天生的特工人才。一九三二年三月，被蔣介石指定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一九三二年九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陳立夫）成立時任二處處長。這位黃埔六期生後來居上，所擔任的實職、所掌握的權力，一躍超過不少高他幾級的黃埔生。戴笠的二處為軍警處，負責掌握各軍隊的動向，特別是對非中央軍進行內部滲透、安插、收買、竊聽等，一有風吹草動，各地的情報會迅速地彙集到他手中，由他綜合分析判斷後，隨之採取相應的措施。

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自然是戴笠重點監視的對象，為掌握張、楊的動態，戴笠對張、楊周圍的親信人物主動交往，以錢、色、情、職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然張、楊見怪不怪，對戴使用的這套特務手段應對有方，陣腳不亂。

東北軍剛入陝之時，由於兵力強盛，與西北地方實力派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還有些磨擦，張、楊之間一度也有些誤會。後來在張學良親信高崇民和共產黨人的協調下，張、楊都明白過來，他們之間如加深分歧，這正是蔣所希望的。為不被蔣各個擊破，雙方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分裂，不打內戰，合作共促蔣介石抗日，這樣才能報國難家仇，才有可能使他們部隊的實力不致被削弱。

張、楊都是有心機的政治人物，為麻痹戴笠、CC所派特務們的監視活動，雙方之間的往來採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還故意暴露一些雙方矛盾對立的事件。這些舉措，把

老奸巨猾的戴笠和張、楊身邊的晏道剛都矇騙了，他們滿以為張、楊「強龍」和「地頭蛇」鬥爭好戲會隨著劇情的深入連續上演，卻不知張、楊賣個破綻，虛晃一槍，把戴笠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事實也得到印證，由於戴笠這一情報系統的重大受騙，導致西安扣押蔣介石事件的順利進行。

實際上，扣蔣的軍事調配部署還是有不少響動的。自十二月八日張、楊決定實行兵諫以後，雙方分別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東北軍方面，以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為臨潼行動總指揮，一〇五師第一旅兩個團在華清池周圍地帶警戒，以防備在採取武力行動時，蔣介石的衛隊掩蔣突圍；一〇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率孫銘九的衛隊第二營和王玉瓚的衛隊第一營守衛華清池頭道門，用一個連擔任扣蔣任務，又調回甘肅固原的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和在長安軍官訓練團受訓的騎兵第六師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五參加行動，因二人槍法精準，必要時可以有效對付蔣介石衛隊的反抗。

十七路軍方面，調配以十七師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為行動總指揮，宋文梅之特務營擔任扣留西安招待所等處的蔣系軍政要員任務；孔從周的警備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導營負責解除憲兵一團、省保安處、員警大隊、省政府常駐的憲兵連和飛機場駐軍的武裝，並佔領飛機場，扣留作戰飛機，以及擔任西安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團負責車站方面的警戒。為保證行動的準確、迅速，孔從周部還在西安城內按蔣系軍、警、憲、特駐地的位置，進行了軍事演習。

對於這些調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強的軍事演習，戴笠分布在張、楊內部的特務和耳目竟毫無察覺和報告。雖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著邊際的資訊，但都為沒有實據的傳聞，戴笠斟酌後，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對於這些傳聞，早在戴笠之前，陳誠亦向蔣介石彙報過，且比戴彙報的還要詳細。或許事前不知情還可推說是張、楊保密工作嚴密所致，但事後不知情，且應對速度如此之慢，

則素以情報靈敏著稱的戴笠就無法解釋了。

南京得到西安發生兵變的消息是中央軍樊崧甫部於十二日下午三時多發出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戴笠獲知西安異動後，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無回應。直至次日，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才報告戴笠：張、楊異動，校長被押，情況不明。而此時，公開媒體都報出確切消息，張、楊《對時局宣言》在十二月十三日西安《解放日報》上刊登；宋美齡已收到張學良發出的電報，連遠在香港的宋子文也獲知確情。這一切無疑是打了戴笠一記悶棍，他的情報機構全線啞巴，他要獲知西安的情況還得通過其他管道來瞭解。

事前被矇騙，事發不知情，事後仍不明，戴笠感到無比的羞愧和恥辱，這是他的直接失職，也是他從事特務工作以來最大的失敗。

戴笠惶惶終日，度日如年，特別是南京當局決定準備對張、楊大肆討伐之時，戴更感到事態的嚴重，一旦戰火發生，不僅校長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將重大逆轉，前途不僅僅是渺茫而已！

「復興社」頭目文強對此有形象的記述：

我記得事變發生的三四天之內，戴笠哭喪著臉，繞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辦法是趕快找到能飛簷走壁的夜行者，準備爬越城牆，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¹

1 文強：《復興社在西安事變中分成和戰兩派》，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二八一—二八二頁。

正當戴笠萬念俱灰之時，轉折卻突然到來，宋子文從西安返京後，即邀戴去他住處，並告訴他將再次返回西安，並請戴一道同去營救委員長。這使他既吃驚又欣喜，他終於感到宋子文還是重視他，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啟用他。

想此前，由於宋子文的地位、出身和其高傲的性格，一直不把戴笠放在眼裡，而戴笠則處心積慮地巴結這位喝過洋墨水的財政大臣、國舅爺。

巴結的機會終於來了。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宋子文在上海北站被行刺，而兇手逃之夭夭。警方出動了大量警力，進行地毯式搜查，也未有任何進展。一時之間，刺宋凶案竟成懸案。為取悅宋子文，戴笠決意投入重要力量和資金偵破此案，經過四年多的努力，乃至千里跟蹤、追捕，終將兇手從蘇北由沈醉押回上海，成功破案。宋子文聽到彙報後，極為高興，當場簽發一張五千元支票給沈醉以示獎勵。沈醉清楚戴笠此時的想法，堅不接受這筆豐厚的獎金。陪同前往的戴笠連忙補充說，抓獲兇犯是我們的職責，部長哪用鉅額獎勵云云。

自此以後，宋子文對戴笠親近起來，並對他過人的精明、卓爾不凡的辦案能力，刮目相看。宋子文雖然想偕戴笠同去，還是覺得須徵得張學良同意和何應欽認可，張學良回電表示同意，而何應欽初未首肯，並責問為何要讓戴雨農去，後礙於宋子文的堅持，亦不多加阻攔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戴笠在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迄今所見的史料看，沒有作為。此行張、楊並沒有為難他，反而給予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也許為了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機極深的戴笠卻留下一份怪誕的遺囑，遺囑是這樣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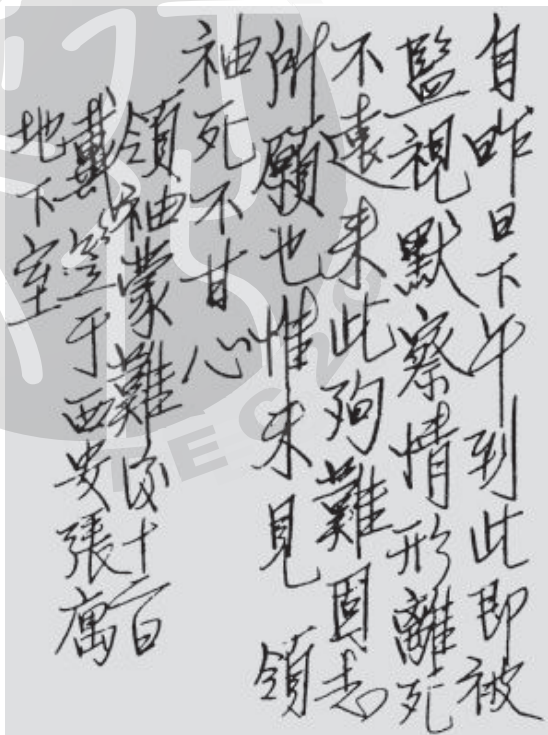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
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
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
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
日，戴笠於西安張（學良）寓
地下室。¹

這份遺囑實是戴笠城府之深的
典型體現，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
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
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後攫取遇危不

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為他進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塊高高的墊腳石。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袖蒙難後十二日」之語推算，當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戴笠到達西安還只有一天，他是二十二日傍晚到達，二十四日離開的，停留在西安的時間再這麼算也不到兩個整天，只兩個晚上和一個多白天而已。那麼，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們來看看。

先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

二十二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張學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而戴則隨宋子文、



戴笠西安手書「遺囑」影印

1 良雄：《戴笠傳》插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蔣鼎文與張學良洽商有關西安事變之事的處理問題。此事見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念集相關記載。

是晚戴在張學良公館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中說：「張（學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蔣鼎文紀念集載，宋子文也與他們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二十三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於是趕忙召集蔣鼎文、戴笠商議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後提出一個反建議方案，並報蔣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記有較詳細述及。顯見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不會一時三刻的，而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准後」，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二十四日，戴笠「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一起的活動。

再來看戴笠此行的身分：

戴笠此行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張學良出面邀請的，戴是同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一樣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實際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談判的代表之一。此事宋子文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這樣記載：

- 一、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並改變其聽天由命的態度。
- 二、由戴雨農（笠）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

……

我把我的決定通知張、楊，獲其同意，且張（學良）給蔣夫人與戴（笠）寫了信。

經過如此官方商定程式奔赴西安，且是解決事變問題的關鍵時機，張、楊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拘禁扣押一個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張學良是一位重義守信、有點江湖俠義之人。孔祥熙、宋美齡、黃仁霖及陳誠等都多次提及這一點。孔祥熙說：「張學良平素為人，素重信義。」黃仁霖說：「張學良雖然輕率魯莽，卻還是一位信守諾言的人。」宋美齡說：「余固知張學良之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義），今更得證明矣。」至於張學良對待南京所派，特別是由他所邀使者的接待誠意，陳誠《西安事變紀事》記錄張學良的表態可予印證：

「十二月十八日，今日張（學良）來，謂子文、墨三均擬來陝。一民（朱紹良）問張，他們來了，保能不失自由嗎？張答，那我不能失信。」

以戴此時的「南京使者」身分，又在事前徵得張學良所同意，張不可能去「失信」而「自降身價」，去把戴監視扣押。

其四，從蔣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動來反證。這兩天蔣鼎文除與戴一起參加上面所述的相關談判和商討，還一起住在張學良公館地下室（包括宋子文），現在所能看到的資料，只是蔣鼎文比戴笠多了會訪陳誠、面見蔣百里、會見周恩來溯昔談今的行動。而其餘時間，宋、蔣、戴等都是在「集體」商討對策和活動。不可設想，對同住在一起的幾個人，一個讓他有合適的行動自由，一個會去做「離

死不遠」的囚徒式看管。客觀事實也說明，張、楊沒有對戴這樣做。

其五，前已述，戴與「二宋」同來，且戴是宋子文向張學良推薦並獲張覆函同意所來西安之人。按照張、宋的關係，即或張對戴有「除去」之想，在這種場合，在這種特定情況下，張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況這時候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在即，「閻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斬戴笠這種「小鬼」呢？

其六，還有資料證明張學良對戴笠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監管，且還予以相當禮遇。五十多年後，也就是張學良八十九歲在美國接待郭冠英訪問時，郭舊事重提：「您在西安事變時，對戴笠不錯啊！」張學良默然無語。

「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麼其時的戴笠就是「死囚」監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二十四日自由自在悄悄地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在西安，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可以採用各種方式，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戴笠縱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張、楊之網。

戴笠在二十四日不告而別離開西安，是已經證明了的史實。而有些著作對此視而未見或見而未聞，不斷向戴笠臉上貼金，如影響很大的良雄先生所著《戴笠傳》：「十二月二十五日，事變急轉直下，張學良斷然決計，親身護送蔣公飛往洛陽。戴氏亦獲釋放。張學良要求和他同乘一機，顯然離開西安以後，客主之勢已變，他需要戴氏來保護他。」¹這樣的描述，首先不符客觀事實，戴笠不是二十五日「亦獲釋放」，而是在前一天，即二十四日就離開了西安；其次沒有這個可能，張學良是二十五日自己駕機前往洛陽，根本沒有，也不存在邀請此時已不在西安的戴笠，來「同乘一

1 良雄：《戴笠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九一頁。

機」，來「保護他」的可能性。

張學良當年為什麼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帶來西安，無論從當時的情況看，還是晚年的張學良口述中，似乎都是在對戴笠的特務行徑嬉笑怒罵，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政治家在盡情地戲謔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即八月底，在西安的特務們不通過張學良，就捉捕了張學良身邊的人，包括東北大學的大學生宋黎、馬紹周和關時潤等。張學良憤然道：「抓人居然抓到我的頭上來了。」於是乘機武力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並收繳到不少特務彙報的關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情報，還有關於張學良本人的。這次行動羞辱了CC和戴笠的特務行徑。

戴笠這次到西安後，張學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下馬威。張學良當時的親信高崇民是如此記述戴笠在機場繳槍以及戴是如何向張訴求的：「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齡負著和平的使命來西安，蔣的特務頭子戴笠亦隨機來西安，戴下飛機後，腰中插的手槍被我方戰士繳械，到金家巷見張學良時泣訴其事，張立即把自己帶的手槍摘下贈戴。戴大為感動，叩謝之餘，口稱副司令偉大不止。平日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特務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於此極，大為可笑。」如果張要讓戴「殉難」，還會還給他手槍？

其後，張學良以語帶機鋒的口吻問戴笠：「老戴，你們的特務工作是怎麼做的，我與楊司令搞了這麼大的事情，你們都不知道？」

戴笠一臉茫然，囁嚅半晌才回答道：「我們從來不對副司令做特務工作啊！」¹

¹ 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西安事變史料》第二輯第九五—九六頁。

對於特務們的伎倆，張學良一直是看不慣的，也一直說特務們對他是沒有什麼作用的，他甚而對特務們的行動都看在眼裡。直至晚年，拂去紅塵，心平如鏡之時，張學良依然記得特務們的歷歷往事：

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說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出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里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說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

我對王新衡（特務二處西北區區長）說：你們特務就做那麼些事，胡扯蛋，光做胡扯瞎扯的事。唐德剛的岳父（吳開先）也是CC大將之一，CC更糟糕。後來他們那些玩意兒我都看見。

（特務）報告那些事，是什麼玩意兒，花那個錢真冤枉透了。所以那時中央吃這個虧吃大了，所以各省都對此沒有好感。沒好感的原因就是他們（特務）在裡面搞的，中央就信那套。

蔣先生太狹隘了，天下就敗在CC與戴笠手上，總是安個特務在你身邊，蔣先生就喜歡聽這些人的話。¹

戴笠這趟短短兩天的西安之行，借「遺囑」之名，盡獻忠之實，他為了自我保護，轉移失職之過，竟違背實情，矯揉造此「大作」，其心機之深，可謂無以復加。而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戴笠隨蔣、宋輾轉回到南京，與鄭（介民）等見面，彼此彈冠相慶，儼然以功臣自居。」²

戴笠也許沒有想到「西安事變」的當事人張學良、宋子文、蔣鼎文、陳誠以及曾擴情等都會有

1 《張學良口述西安事變》，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七頁。

2 文強：《復興社在西安事變中分成和戰兩派》，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二八一—二八二頁。

各種文字，通過不同管道披露出來，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當時的事實真相。這些角度不同且無意之中的記述，並非針對戴笠而寫，然通過互相對照佐證，可以還原當時情況。足證戴笠的「遺囑」是沽名掩世的「遺作」，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位著名的特務天王留下了又一個著名的歷史笑柄，供後人茶餘飯後把玩。可見要掩飾歷史實情，有時也是很難的。

九、陶菊隱的直筆與曲筆

為方便對照，在此重述陶菊隱所著《蔣百里傳》中〈西安歸客談〉的有關文字，若干處與前文略有重覆，請讀者見諒。

〈西安歸客談〉所涉蔣鼎文的部分，陶菊隱作如下描述：

第五天，也就是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張（學良）又過來通知百里：「我已經取得了委員長的同意，今天馬上陪您去見他。」

到了高桂滋公館，張先進去報告說：「百里先生來了。」蔣躺在床上不答腔。但當百里進去時，他卻面帶笑容，欠身握手，就讓百里坐在床邊的一張沙發上。張舉手向蔣敬禮，自行退出，順手帶關了房門。

蔣向百里說：「張漢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談，其心目中以你最適宜，但我未置可否。」

正談到這裡，房門動了一下，張守在門外想推門進來。蔣即呵斥說「不許動」，那扇門又輕款地關上了。百里認為南京與西安之間相持不決，已經形成僵局，贊成派人前去商談一下，但

本人與黨國關係不深，去了於事無補，必須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決問題。

房門又在緩緩地移動著，蔣呼：「進來。」蔣叫張「送百里先生回去休息」，於是百里與張相偕退出來。

張邊走邊告訴百里：「委員長同意接見您的時候，不許我在旁竊聽，我表示遵守，他才叫我不來接您。」

下面是百里與張的問答之詞：

「你是否有打破僵局的誠意？」

「您怎麼懷疑我沒有誠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為您是無黨派色彩的軍界老前輩。」

「事前何以不同我商量？」

「想您見過委員長再告訴您。」

「我去南京接不上頭，最好派一個能代表委員長的軍事大員前去，才有辦法。」

「您看誰好？」

「留在西安的軍事大員之中，你最恨的是誰？」

「我不恨什麼人，只有蔣銘三這個人好出壞主意，我就是看不順眼。」

「那麼最好派銘三去。」

「這是什麼道理？」

「派一個最不喜歡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絕無傷害其他中央大員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對和平解決時局抱有極大的誠意，這樣就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

「很好，我不但同意派他去，同時還想請委員長寫一道停止轟炸西安的親筆手令交他帶去。」就在這一天，張又去見蔣，把他同意派蔣鼎文到南京以及帶親筆手令的話如實彙報。但是，此後又發生了兩個新的問題：第一，蔣怕親筆手令落在張的手裡，傳出去將成為一樁笑柄，因此不肯寫；第二，百里主張把親筆手令直接交給蔣鼎文，張又怕兩蔣關起門來講私房話，對他不利。直到第六天（十二月十七日），又是百里出主意，叫張陪同蔣鼎文去見蔣，蔣直接把手令交給蔣鼎文，即同時退出（二蔣並未單獨談話）。問題解決後，蔣鼎文當天從西安飛往南京，南京政府當天將此令製成珂羅版，送往京滬各報發表。¹

本節文字透露的主要資訊有三個：

第一，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以後，蔣百里去見蔣介石時，蔣介石對百里說：張學良想派一個人去南京商談，他心目中的人選以你為最宜，但我未作答覆。百里忙向蔣表態，他覺得自己不適宜。第二，蔣百里與張學良商定，派能代表蔣委員長軍事大員蔣鼎文去，在去南京商談的同時，張學良還讓他帶上由蔣介石親筆下達的停戰手令。之所以派蔣鼎文去，是因為蔣鼎文為張學良所「不

¹ 陶菊隱：《蔣百里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三〇——一三二頁。

順眼」或「不喜歡」的南京方軍政大員。

第三，十二月十七日，張學良陪同蔣鼎文去見蔣介石，蔣把停戰手令交給蔣鼎文，張認為「二蔣」未單獨談話，接停戰手令後，張與蔣鼎文同時退出蔣住處。蔣鼎文當天（十七日）從西安飛南京，南京政府當天（十七日）製成珂羅版送各報發表。

陶菊隱這篇文章疑點甚多，且時間節點不符合史實，試作梳理分析。

首先看人選問題，張學良派去南京的人選，從一開始就定下蔣鼎文，而並非完全是蔣百里所提議。陳誠在《西安事變紀事》載：「今日張（學良）來招待所時，頗現猶豫之色……余謂百里、雨岩（蔣作賓）諸先生，未有直接關係，不可請其回京設法乎？張答此須開會討論，非我一人能決定，繼稱子文、墨三（顧祝同）若能來此，則可請銘三（蔣鼎文）回京一行。」很明顯，張學良對陳誠的提議讓「百里、雨岩去」是不同意的，張學良非常明白告訴陳誠，我們擬「請銘三回京一行」。

蔣鼎文去南京是有南京官方的態度作支持的，何應欽十二月十五日給張學良、楊虎城發去一封「刪電」：「兄等關於救國大計之主張，如果有利於國家，中央無不採納……或於雪軒（陳調元）、銘三（蔣鼎文）、俊如（衛立煌）諸兄中即日請二人來京」¹。

派誰去南京洽商，絕非簡單之事。所派之人張、楊要選擇，蔣介石要首肯，南京方要認可，也是一種「三位一體」，如果加上本人，實際上是四方要認可。現在南京方對所派人選有了建議意見，張學良也已定下，蔣鼎文本本人亦點頭，那麼只要蔣介石同意，「出使」之人就可以定下來。所以，當張學良徵詢蔣介石擬派蔣鼎文去南京之時，蔣介石乾脆利索的一聲「余可之」就敲定了。

1 《何應欽致張學良、楊虎城刪電》，轉引自李仲明：《何應欽大傳》，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五九頁。

這並非說蔣百里不參與會商蔣鼎文去南京之事，實際上張學良早已定下，因為讓張學良找陳調元、蔣百里等相商正是蔣鼎文在西安事變當日下午首先建議的。當然蔣百里在蔣鼎文去南京事中起了促成作用，然非決定作用。

其二，陶菊隱在《蔣百里傳》中說，因為蔣鼎文是張學良所不喜歡之人，所以派他去南京。這裡有三個疑點，第一，蔣鼎文到底是不是張學良所不喜歡的？第二，即或蔣鼎文是張所不喜歡之人，在當時非和即戰、大軍壓境的嚴峻形勢下，張學良敢不敢派一個「不喜歡的人」去南京洽談和傳令。按照後來臺灣國民黨史書評述，派蔣鼎文去南京是一個「直接影響於中華民國歷史發展方向」的大事。第三，即或蔣真是張所不喜歡之人，南京方面怎麼能知道此時的張學良已對蔣鼎文「看不順眼」了？又怎可能產生「積極的效果」？這些大概可歸類於政治常識問題，而這類常識竟被我們「源遠流長」、津津有味地傳播不絕。

對於張不喜歡蔣的問題，當時圍攻西安的中央軍隴海線前敵指揮官樊崧甫曾有說明，認為這是張學良誤會蔣鼎文所致，然在人選對號上，樊是「蔣冠衛戴」了。樊在《親歷西安事變》一文中是這樣分析的：

十七日晨，張放蔣鼎文乘飛機回南京接洽。張學良何故對蔣鼎文最厭惡呢？實際上是一個誤會，張與蔣素未共事，沒有恩怨，因蔣介石在西安召集高級軍政人員會議，對張建議聯共抗日相持不下，蔣擬以衛立煌（應為蔣鼎文，否則，下文不通。蔣介石的實際任命亦是實質「以蔣代張」。）代張，把東北軍開福建，東北軍調福建對張透露了，繼任他的人卻沒有透露，那時蔣鼎文是福建綏靖主任，張以為東北軍調福建是繼十九路軍消滅的徵兆，繼任的人猜定是和蔣

鼎文對調，所以對蔣鼎文特別厭惡。¹

如果真是這樣，則張學良是「恨屋及烏」了。

其實張學良對蔣鼎文不是「不喜歡」，相反卻是相識相知、氣味相投的好朋友。蔣鼎文對此有個回憶：

張學良以前在華北、東北，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我們之間是沒有什麼淵源的，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那時東北已陷，華北情勢嚴重，正是國難當頭，共產黨禍患未已，日本侵略日亟。那一年年底，中央把高級將領召集到牯嶺，快要過陰曆年了，天氣奇冷，委員長要考驗我們這些高級將領是否還能吃苦，以擔當來日艱鉅任務，要我們在牯嶺爬山，安徽省政府主席劉鎮華還替我們預備小米稀飯，慰勞我們。我在牯嶺時和張漢卿、顧墨三三個人分派在一個房間住宿，這樣便和張漢卿由相識而變成好友，那時我們都正當壯年，每個人都是意氣豪邁，自然而然的相處得非常投機。有一天夜間我們暢談國是，張漢卿談到他自己父仇未雪，和東北故土未收復，又談到東北淪陷之後，全國上下，尤其當時當政的汪精衛對於他的苛責，忍不住內心的悲憤，竟然放聲大哭起來，一直哭到天亮，這是我與張學良初次相處的經過，我覺得他還是有許多可取之處。²

1 樊崧甫文，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第一八九頁。

2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七—四八頁。

這篇回憶寫於西安事變三十多年後，當時蔣鼎文所述說的張學良依然是一個待罪之身的「拘禁之囚」，而不是當年風雲際會的少帥，然蔣鼎文始終認為他與張是「好友」，有「許多可取之處」，兩人的友誼並不隨政治風向飄逝。

前已述，臺灣官方史書也講到，派蔣鼎文出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除蔣鼎文對剿共具有勇敢善戰的經驗外，蔣介石還考慮到他與張學良兩人感情融洽，可以相處無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蔣鼎文被扣的當天，張學良去蔣鼎文的房間看望蔣，兩人交談甚深，張對蔣述說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講了很多委屈和不滿的話，並且徵求蔣鼎文對此事的處理意見和主張；蔣鼎文適時地講了此事需要溝通，並通過周長臨輾轉，讓陳調元、蔣百里與鮑文樾、張學良找到了設法解決問題的管道。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蔣鼎文在西安的九天中（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蔣在洛陽、南京），除十四、十五日尚未見直接記載外，其他的七天，蔣鼎文、張學良二人都在絞盡腦汁，不懼危險商量解決西安事變之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蔣鼎文與張學良又在洛陽見面。蔣慨歎張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

次年一月中旬，也即張學良被禁、扣押於奉化溪口以後，蔣鼎文又陪著張學良東北軍父執輩的老部下莫德惠（柳枕）、劉尚清專程去溪口看望張。

張學良對蔣鼎文也很有好感，認為蔣鼎文這個人識大體，一起共事能相處融洽。而在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對蔣鼎文的信任和囑託更多反映在兩人之間談話和電文上，對這上面已多次提及張對蔣的深深期許。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張學良駕車送蔣鼎文到飛機場時對他推心置腹，交代了三樁要事，此事前文亦已述及。

十二月十九日，張學良致電已在南京的蔣鼎文，重申自己欲解決西安之事的誠心：「兄已澈底明瞭，請兄返京，確是誠心誠意，力謀解決此事」；「弟等發動此種驚人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之度外」。¹

至於張學良為何委託蔣鼎文到南京去溝通協調，在張學良給孔祥熙的電文中也有類似反映。

不可設想，這樣的「驚天大事」，張學良會委派一個不喜歡的人去南京力阻戰火燃燒。這個人只能是與張公誼相交，是張認為可以託付，在南京一片武力「喊打」之聲中依然會「誠心誠意，力謀解決此事」的人。

蔣、張兩人都是帶點綠林豪氣的軍人，一個是東北漢子的俠義肝腸，一個是浙江諸暨人的爽直剛強，他們的關係只會在患難中同步共振，而不會相反。

其三，「二蔣」在十二月十七日是否談過話，陶菊隱說「二蔣並未單獨談話」，亦是不確。蔣介石十七日的日記，對談話與否，未有記述。但從蔣鼎文十七日中午自西安發給何應欽的電文中則可看出，「二蔣」是當面交談了。電文云：「文正預備起飛時，聞空軍轟炸三原，又生枝節。委座面諭、手令均令停止一切轟炸衝突，務望迅飭全線陸空軍遵令辦理，余俟文到京後面陳。」除「手令」無法說清外，蔣介石對蔣鼎文還作了「面諭」，所謂「面諭」當然是談話和當面交代，而蔣鼎文的自述則講到他趁張學良外出瞬間，向「委員長」說了關鍵話。

1 《張學良致蔣鼎文電》，轉引自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第五四六—五四七頁。

另外，在文中，陶菊隱先生把時間節點也搞錯，有點下筆放縱。《陶文》說：蔣鼎文十七日當天從西安飛南京，又在當天把蔣介石的手令製成珂羅版在京滬各報發表。蔣鼎文是十七日夜宿洛陽，十八日午時許到達南京，十八日下午把「手令」交給何應欽，十八日晚上中央開會商討，聽取蔣鼎文匯報，直至晚上十二點以後才散會，這些都有歷史記錄在案可查。怎麼可能「在當天」（十七日）把蔣介石的絕密手令製版發往京滬各報呢？

據現在所看到史料，蔣鼎文飛出西安的消息，最早報導是《大公報》鄭州十七日晚九時電：「聞將送蔣鼎文出陝，向中央陳述意見。」此時從未有任何報紙提及「蔣介石手令」之事，因為這在國民黨中央統一意見之前是一個高度的機密。

說陶菊隱先生有點「下筆放縱」，還可將他本人的兩本相關著作對照起來看。《蔣百里傳》雖遲至一九八五年出版，然其中的「西安歸客談」章節卻寫成於一九三七年初，對這，陶在書中有說明。陶菊隱另一力作《蔣百里先生傳》於一九四八年初版，他在該書的「西安事變的不速客」中，對前書所述的張學良與蔣百里之間對話作了不小的修改。也為方便對照，不得不再花費篇幅予以節錄：

（蔣百里）：「你是不是有誠意呢？」

（張學良）：「怎樣懷疑我沒誠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您是無黨派色彩的人。」

「何以不對我先說明？」

「想您見過委員長後再告訴您。」

「我非黨國要人，去了於事無濟的。要解決問題須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人物。」

「誰好？」

「我看蔣銘三最適宜。」

「好，我不但請他去，而且請委員長寫親筆信讓他帶去。」¹

不難看出，這裡的全部對話中，全沒有一九八五版的陶著《蔣百里傳》中——蔣百里問張學良「最恨是誰」，以及張學良答說「蔣銘三好出壞主意，我就是看「不順眼」的話，在這裡，那本《蔣百里傳》中張所說恨蔣鼎文的「前因」，以及蔣百里附和張學良心理的話的「後果」，都沒有了一點蹤影。相反的是卻出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蔣銘三最適宜」的話。

同樣一個著名記者，同樣一件歷史事實，同樣一個「蔣銘三」，同樣一個作者筆下，那裡是「不喜歡」，這裡是「最適宜」，只能說陶先生寫「蔣百里傳」時沒有採用史家筆法，當有點類似於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有點任意剪裁。可後人就不作如是觀了，統統以陶先生的描述作為第一手「史實」在引用。還有這一版的《蔣百里先生傳》，對蔣介石將手諭面交時間和地點說成是「蔣鼎文上飛機時見蔣（介石）面交」，亦與一九八五年《蔣百里傳》表述有所不同。至於《蔣百里先生傳》另有一些史實失誤處，或允另外撰文商榷。

1 陶菊隱：《猶介與風流·蔣百里先生傳》，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二八四頁。

前面已經說了，陶菊隱先生是個著名的報人，再加其採訪的對象是西安事變的當事者之一，因而有一定的權威性，故而對此歷來少有異議，且一直被學界乃至某些研究者承襲。如今隨著西安事變當事人的日記和往來電文陸續披露，人們可以從更多的角度去瞭解這段歷史事實，而不是囿於新聞人一家之言了。且現今所見及解密的這些電文和日記等原始資料，又是當年如陶菊隱先生們所無法看到和獲知的。也許這就是歷史有時反而越遠越真實吧。

以上是陶菊隱《蔣百里傳》的直筆部分。陶菊隱先生可能還另有難言苦衷，因為在本書中，陶菊隱先生還有很重要的「曲筆」。

陶菊隱《蔣百里傳》末尾有一番意味深長的話：「當時，軍政界上層人士有人知道這件離迷惘恍的內幕新聞，一致認為百里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問題迎刃而解。其實，內幕之外，還另有內幕，百里做的只是一篇表面文章，連百里本人也不知道。」¹

根據現在所知的資料或可揭開這個「內幕之外的內幕」以及百里先生所做的「表面文章」了，這個「內幕」和「表面文章」當是：十二日下午蔣鼎文對張學良的一席談話有所觸動，在不斷溝通之中，張學良與蔣介石已經商定，南京方面亦同意，讓蔣鼎文去南京傳令遊說。這是否可視之「連百里本人也不知道」的「內幕」。至於事關雙方放不下「尊嚴」之事，無非讓蔣百里來挑明而已。政治的波譎雲詭也許就是如此。

1 陶菊隱：《蔣百里傳》，第一三二頁。

十、蔣鼎文夫人的不白之冤

西安事變是民族的大事、國家的大事，而對當事者來說又是家庭的大事，家庭成員為之提心吊膽無疑甚於旁人，如蔣鼎文的夫人蔡文援女士就為其丈夫牽腸掛肚，且「牽出」一樁歷史冤案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蔣鼎文隨宋氏兄妹從南京飛赴西安，蔡文援本想隨機前往，但宋美齡考慮到各種因素，不希望她一起前去，故未能成行。其後凡寫到西安事變的書，多以此作為細節花絮，說蔣鼎文夫人蔡文援哭哭啼啼阻止其丈夫返回西安，爾後被宋美齡訓斥了一頓才作罷。這些書籍是這樣寫的：

「飛機起飛前，蔣鼎文的夫人蔡文援生怕其丈夫再入『虎穴』，當著宋美齡、宋子文的面，哭哭啼啼，阻止蔣鼎文再去西安。宋美齡卻對蔡說：『你是一個國家大員的夫人，一切事情應以國家為重，不能憑夫妻感情來阻止丈夫為國效忠。』蔡文援這才作罷。」

除了這種寫法，再無第二個版本，且各種書籍所述文字幾乎都相同。這種說法概起源於宋美齡的《回憶西安事變》，宋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時蔣鼎文亦已出陝來京，余念委員長或需軍官如彼者為代表，請彼與戴笠偕行。且對西安表示中央之信義，決不一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然鼎文夫人方喜其夫得離危城，故力請偕行，堅持不讓其夫獨冒此險。翌晨，余在機場懇切勸之曰：「余非強蔣主任為余所不願為者，余一婦人，所冒危險實較汝夫更大。汝夫為軍人，其生命本已貢獻於國家，汝為一高級軍官之夫人，應鼓勵而安慰之，此方是汝之本分。」鼎文夫人乃默許余言，慨然允諾，不復悲戚。孔夫人在側，

亦以溫言慰之，攜之側立。余等即登機行矣。人或稱余此行為勇敢者，然余自念，所作所為並無異人處，二萬萬中國婦人處余地位，皆必取同樣步驟。鼎文夫人經余說明後，竟不堅持同行，而肯為國家利益犧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¹

宋美齡這段話，文平句順，意思清楚，蔣鼎文夫人蔡文援女士「力請偕行」，即與丈夫相伴而行去西安，不讓其丈夫一個人去冒險，夫婦倆願同入「虎穴」。宋美齡認為，在這個時候，你不應堅持夫婦同去，而應鼓勵蔣鼎文一個人去履行職責。經過勸說，蔡文援在機場「不堅持同行」西安了。宋美齡認為蔡文援這樣做是為國家利益犧牲其丈夫之安全的一個事例。

顯然，宋美齡的意思，你一個婦人同去會增加丈夫蔣鼎文的負擔，夫婦倆不要一起去冒險，一個婦人同去「危城」，作為丈夫的蔣鼎文顧慮後的事情就又多了一層。正像蔣介石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變半月記》所記那樣：「妻見余強作歡顏，而余則更增憂慮。蓋旬日以來，對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後乃更須顧慮余妻之安危。」在這種險境之下，丈夫自身都難保，二人同在，自為妻子多了一份擔心。

宋美齡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宋的私人秘書錢用和對此有憶及：

夫人決定冒險前往虎穴，探視委員長，我即向夫人表示願同行供驅使，因家有兄弟及幼妹，父母早逝，又未婚嫁，孑然一身，無所顧慮，請夫人俯允。夫人謂在此種情況下，不能多帶隨員，

¹ 宋美齡：《回憶西安事變》，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第三四四—三四五頁。

免增麻煩及精神負擔，如能成行，只攜侍媼蔡媽（祺貞）同往，可供使喚。¹

宋美齡勸說蔡文援不要同去，還有一個技術原因也或有關。宋子文的英文秘書陳康齊的《西安事變日誌》有載：

早上得到消息，我們要去西安。上午十點，有人通知我們去機場待命。蔣夫人將與我們同行，飛機上要裝很多東西，所以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行李裝到福特號飛機上。上午十一點，宋博士與蔣夫人一起來了，他們立即上了飛機。有很多人，還有衛兵或軍官們都自告奮勇，要求隨大家一道去，宋博



一九五七年蔣鼎文夫人（蔡文援）與宋美齡等合影

1 《錢用和回憶錄》，東方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九頁。

士告訴蔣夫人，飛機裝不下這麼多的乘客，所以命這些人就不要隨行了。¹

在這個非常時期，蔡文援願陪丈夫一起同入虎穴，似應投去一份敬意。這次去西安，不是去風光，不是去遊玩，不是去顯總司令夫人的派頭，而是要去同患難乃至去冒殺身之禍風險的。蔡文援這樣做，可比同一時期同樣的一位二級上將夫人強多了。李宗仁在他回憶錄中提到這樣一樁事：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蔣先生飛抵廣州，電召白崇禧飛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與某中央訪桂大員提及，如蔣先生認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謁見。至是，蔣既來電，白氏似有踐約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馬佩璋）聞訊，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並向我哭訴。但我認為，丈夫一諾，重於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應代其一行，雖然我本人並未作此諾言。九月十七日，我乃隻身飛廣州，謁見蔣先生。²

對於此時赴西安的危險，連宋子文的秘書們都膽怯了。他們認為，對他們的威脅不僅僅來自張、楊，因為當時南京風傳西安已紅旗一片，全城被共產黨佔領，軍隊已經失控。陳康齊是如此記述的：

南京市面上流傳著許多謠言，據說，西安全城到處插滿了紅旗，張少帥已失去對軍隊的控制，

¹ 陳康齊：《西安事變日誌》，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第三六四頁。

²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〇六頁。

等等。這些謠言令我們很不安。宋博士的許多朋友都前來勸他取消行程。陳鳳康向我建議，請求宋博士不要帶我們兩人前往西安。他認為，如果旅途危險，白白犧牲兩條性命沒有意義，但不願跟宋博士講。¹

蔡文援從未阻止其丈夫復返，且堅持要隨丈夫一起去西安。宋美齡的文字明明是在安慰表揚她，甚至拔高到「她肯為國家利益犧牲丈夫之安全」的高度，怎麼在我們某些文史學家筆下變成宋美齡訓斥她了呢？如此明白淺顯易懂的文字，我們為什麼要作大相徑庭、甚至是南轅北轍的嘲諷呢？

蔣鼎文夫婦早已作古，他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對此作出解釋。在這裡，我們無意為其作無稽的辯白，只不過希望對這種容易看到和弄懂的史料不要作相反的闡述。

歲月流逝，斯人已去，掩卷悵然，星空無限，掩飾歷史固難，然對扭曲的歷史要恢復其本來面目也很難。在以後的時間裡，蔡文援女士有可能還要繼續蒙受不白之冤。

十一、放鴿執仗的反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蔣介石由西安飛洛繼轉南京，張學良自告奮勇全程陪同，兩位西安事變的主角齊齊抵達另一座古城——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這實際上意味著西安事變的高潮已經過去，餘下的問題是怎樣閉合好這齣歷史大戲的帷幕了。

蔣鼎文從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飛至洛陽，再次持蔣介石的手令宣達洛陽前線停火，南京方面這

¹ 陳康齊：《西安事變日誌》，見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三六三頁。

回不像上次那樣磨蹭了，而是「令行禁止」，全線停火。《何應欽九五紀事長編》對此述及：「銘三先生攜有蔣委員長撤兵之手諭，將軍因令蔣堅忍隨銘三先生於二十五日由洛陽逕赴潼關及華縣，持蔣委員長手諭，晤見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庭瑤，令前方部隊向後撤退一千公尺，避免衝突。」前方戰線停火之事，周恩來在二十五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亦提到。

是日傍晚，蔣鼎文在洛陽迎候蔣介石夫婦一行的到來。接機時，蔣鼎文也見到張學良，一時頗感驚訝，連忙問：「漢卿兄，您怎麼也到洛陽來了？」張學良不無幽默地答道：「銘三兄，我怎麼不能來，我是到南京請罪去的。」

話說到這種地步，兩人也不再多談。但蔣鼎文為張學良感到莫名的擔憂，同時又欽佩張的膽量俠義。張學良一直在說，我有本領請神，就有本事送神，好漢做事好漢當。如今這條英雄好漢在兌現承諾，他要親送蔣介石「完璧」南京，並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責任，哪怕是殺頭也在所不辭。

蔣介石被釋後，扣押於西安的其他軍政大員的釋放自然成了題中之義。

張學良在西安機場隨蔣介石飛洛陽之時，倚在飛機旁，給楊虎城下了一份手令，該手令寫道：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侯指揮。此致：何（柱國）、王（以哲）、繆（徵流）、董（英斌）各軍師長。張學良二十五日以楊虎臣代理余之職。

虎臣為楊虎城的號，孝侯是于學忠的號。實際上這是張學良在做東北軍的人事安排，讓楊、于來指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抵達洛陽後，蔣介石要張學良下達命令，釋放被扣於西安的一千軍政大員。當天晚上，張學良給楊虎城打電報，囑他釋放陳調元、陳誠、蔣百里、衛立煌、萬耀煌等所有被扣人員，二十七日，這一千人被釋；二十八日，閻寶航受宋子文、張學良委託，攜帶給楊虎城的親筆信，飛西安囑楊虎城釋放被扣的七十多架（一說五十多架）戰機及五百多名空勤人員；三十一日，楊虎城遵囑全部釋放。西安被扣釋放人員之一，時任二十五軍軍長的萬耀煌是這樣回憶釋放過程的：

到了二十六日，早餐用完，我們即看到解放日報大標題，張、楊已於昨日恭送蔣委員長回洛轉京的消息，我們欣喜若狂，最妙的是楊虎城中午來拜訪我們，自己打自己兩耳光，說實在對不起。下午衛兵也撤走了，我們一起往陳誠、朱紹良住處合攝一影，以資紀念。楊虎城又在新城大樓請客，由東北軍將領作陪。次日（二十七），我夫婦、陳繼承夫婦、蔣百里先生、蔣作賓先生、陳調元、朱紹良、錢大鈞、陳誠、衛立煌、李基鴻、邵存誠、蔣孝忠、周文章等十五人合乘一架巨型福特機返京。¹

陳誠的回憶也差不多：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日楊虎城來道歉，略謂事起倉促，一切請多原諒。並謂伊等主張已蒙委座採納，昨日下午，業由張學良恭送委座飛抵洛陽云云。此為陝變發生以後，與楊虎城見面之

1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第一次。同時展開本日報紙，亦載有委座與夫人於昨日下午四時離陝，五時半飛抵洛陽之消息，同行者，計有子文、端納諸人。晚，與留陝中央各將領，同應楊虎城之宴，聯歡乎？解嘲乎？無以名之。宴會中楊告知余等，委座已於今午自洛陽飛抵南京，張學良亦隨往。旋出示張之來電，囑於明日送余等回京。

二十七日上午，余與一民及楊虎城同車赴機場，楊與司機同坐前列。飛機自西安機場起飛，下午到達南京。

有些書籍包括《周恩來年譜》這樣嚴肅的書籍，說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釋放名單中有蔣鼎文，這是不確切的，因為蔣鼎文在二十四日已離開西安赴洛陽再次傳達停火命令，他二十七日已在南京了。

《華北日報》在二十八日刊出中央社專電，蔣介石侄子、時任中央航空學校副校長蔣堅忍談「蔣委員長離陝飛洛經過」，內云：蔣銘三於二十二日隨蔣夫人、宋子文再飛西安，而張、楊護送委座出險之議，二十三日即商妥，二十四日即由銘三攜委座撤兵手諭飛返洛（陽），一面由洛電話報告孔代院長，何軍部長，一面復由余偕蔣（銘三）飛赴華縣前線，以手諭傳示各將領，前方均將所部撤退一千米，以免衝突。

西安所羈留的各路諸神，或返寧、或返滬，各就各位，而張學良卻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蔣、宋一行從洛陽飛抵南京。約一個半小時後，張學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也到達，先至孔祥熙公館，後住宋子文在南京雞鳴山的北極閣公館。

南京政府對張學良迅速予以軍法審判。十二月二十九日，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審判會成立，由李烈鈞任審判長，朱培德、鹿鍾麟為審判官，三十一日開庭審判，旁聽席上只有宋子文一人。整個審問過程大約只用了二十分鐘，便下達判決，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權五年」。下達判決的當天下午，蔣介石即給國民政府送上請求特赦張學良的呈文。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國民政府通過特赦案，並發布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在「嚴加管束」的名義下，張學良的長期軟禁算走過了程序，而處合法化。可見被操縱的「法治」，實比個人擅權的行政命令更可怕。幾天以後，張學良被秘密轉移至奉化溪口雪竇寺，在戴笠所控制的特務系統嚴密監視下居住，由此過上了長夜漫漫的軟禁生活。

在處理張學良的同時，蔣介石對西安張、楊之部採取雙管齊下的措施，確定「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方略，以解決西北問題」。十二月二十九日，蔣介石通過國民黨中央名義上撤銷了「討逆軍」，所設總司令部和相關職務也隨之撤銷。但依然施以軍事高壓，實際是換湯不換藥。一月三日，軍事委員會發布圍攻西安的命令，其軍隊序列為：

總司令何應欽，前敵總司令劉峙：

- 一、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下轄十個師，據東線潼關正面。
- 二、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蔣鼎文，下轄五個師又一個旅，據西線甘寧一帶。
- 三、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朱紹良，下轄九個師，據西線陝南、隴南及蘭州附近。
- 四、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陳誠，下轄十個師，據東線右翼，即渭北一帶。
- 五、第五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下轄四個師，據東線左翼潼關以南至商洛地區。

前敵總司令部直轄部隊及預備軍共約十個多師分布在潼洛、新鄉、川鄂邊及寧夏一帶，大部分是二線部隊。

空軍部隊指揮官為毛邦初。

這個陣容可謂鼎盛，幾乎集中了當時所有能征善戰的蔣介石嫡系將領，按照蔣鼎文的說法，這次圍攻「有七個總司令」啊！

蔣介石調動了五個集團軍共計五十多個師，遠遠超過十二月十六日何應欽的「討逆軍」，形成從東、南、西、北四面進逼西安的軍事態勢，以達到威懾、瓦解、分化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目的。

蔣鼎文直接指揮的是第二縱隊指揮官胡宗南，轄第一師、第二十五師、第七十八師、西北補充旅；第十四縱隊指揮官孔令恂，轄第四十三師、第九十七師。

在大軍壓境的同時，軍政部在一月五日發布《整理陝、甘軍事辦法》，對西北軍政人事方面作出調整：

- 一、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承軍事委員會之命，綜理陝、甘、青、寧軍事。
- 二、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
- 三、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于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戴罪圖功。

顧時任軍政部次長，現又任西安行營主任，西安軍政善後的實際工作是交給顧祝同作具體處理。圍攻西安的五大集團軍，以顧祝同東線的第一集團軍為主力進展，其他的則是圍而脅迫。像蔣鼎文與胡宗南等高官並未到所部前線，基本上住在洛陽、潼關一帶。在軍事高壓、政治談判兩手並重下，

楊虎城、于學忠忍辱為上，不作無謂抵抗，再加東北軍群龍無首，內部分化，無奈地接受了蔣介石的安排。二月八日，中央軍宋希濂師和平進入西安。

蔣介石雖然達到了分化瓦解「三位一體」的目的，重新控制了西安的局面，但他也顧及國內外形勢的現實，沒有背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承諾，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確定關於時局的五項方針：

一、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二、政治、軍事應漸進，由近及遠，預定三年至五年內為統一時間。三、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四、加強軍隊之訓練。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¹

二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五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委員會議在南京開幕，根據蔣介石提出的五項方針，討論結束內戰和國共關係問題。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一項名為「根絕赤禍」實為停止內戰的決議案。會議在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識普及於全國」，承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將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此後唯當依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且以奠長治久安之局」。會後，蔣介石密令所屬各處，以後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

1 《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一八頁。

評論說：「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

西安事變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是迫使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轉變了急於剿滅共產黨的內戰政策，而蔣介石也認清形勢，回應張、楊和共產黨的號召，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從而出現全國團結一致的抗日局面。由此，周恩來稱張學良為民族的「千古功臣」。

張、楊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張、楊所付的代價是民族進步所必須的，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蔣鼎文在西安事變期間，為和平解決獻計獻策，奔波不止。四天時間內，他的行程是西安、洛陽、南京、南京、洛陽、西安、西安、洛陽、南京。面對當時南京的洶湧主戰浪潮，面對國民黨內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堅定地說明張、楊「兵諫」的和平主張，竭力澄清對西安的種種不實謠傳，在國民黨中樞機關面前大聲疾呼：「勿任南京、西安間之裂痕日見加深，謾罵之無線電廣播及惡意之報紙論文，皆以中止為佳。」又利用自己在黨軍政界的較大影響，呼朋喚友，多方斡旋，化解矛盾，與宋氏兄妹、孔祥熙等組成了當時還略顯勢單力薄且不符合當時南京政治生態的「和平陣營」。

對於西安方面的主張，蔣鼎文又與宋子文一起，力勸張學良面對政治現實，摒除常規的程式，達到共同抗日的根本目的即可，儘快釋放當時國民政府公認的領袖蔣介石，以免使國家再次陷入內戰泥潭。

張學良軟禁在奉化後，蔣鼎文以朋友之誼，陪同東北元老莫德惠（柳忱）、劉尚清專程探望，暢敘衷曲，既有愧疚之心，也有無奈之情，按照蔣鼎文自己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安慰張學良和撫慰

東北軍的軍心。直至晚年，蔣鼎文依然為張學良的處境「打抱不平」，然亦莫可奈何。

作為一個軍人，其時的蔣鼎文不好戰，不戀權，為制止一觸即發的內戰，合作抗日，一致對外，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是有功於民族的歷史人物。

臺灣當局對蔣鼎文在西安事變中的歷史貢獻有兩個權威評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蔣鼎文去世，蔣介石與蔣經國聯合簽發「總統令」，認為蔣鼎文「危難之時，忠勇尤著」。

臺灣史書在寫蔣鼎文傳略時有內容提要：「蔣鼎文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中保有勇敢善戰的紀錄。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在生平行事中有兩件大事，



西安事變後，蔣中正（中）與蔣鼎文（蔣中正後方）及其他被扣押人員合影於南京國民政府

直接影響於中華民國歷史發展的向……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他）首先自西安飛南京，將張學良主意表達，開始政治解決途徑，終以扭轉危局。」¹



1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蔣鼎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四冊第一七五頁。